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抗衡或扈從：面對強鄰時的策略抉擇〈上〉

The Choice of Strategy Towards One's Strong Neighbor: 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 I )

doi:10.30390/ISC.199702\_36(2).0001

問題與研究, 36(2), 1997

Issues & Studies, 36(2), 1997

作者/Author：吳玉山(Yu-Shan Wu)

頁數/Page：1-32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7/0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702\\_36\(2\).0001](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702_36(2).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抗衡或扈從： 面對強鄰時的策略抉擇\*（上）

吳玉山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 摘 要

本文想要解答的核心問題是：在強鄰的主權要求之下，小國如何應對？具體地來說，是什麼因素決定了小國對大國採取「抗衡」（balancing）或是「扈從」（bandwagoning）的策略？本文首先建立了兩岸關係和俄羅斯與各前蘇聯共和國之間的關係在結構上的類似性，也就是權力不對等（power asymmetry）和主權衝突（conflicting sovereignty claims）。然後在前蘇聯的例子當中，檢驗了從愛沙尼亞到塔吉克等十四個國家經濟發展程度和西方支持程度與各國對俄政策之間的關聯。我們發現：經濟發展程度愈高、愈和西方親近的國家，愈容易對莫斯科採取抗衡的政策；而經濟發展程度愈低、愈和西方疏遠的國家，則愈容易採取扈從的政策。本文最後將此一結論運用到兩岸關係之上，探索台灣的大陸政策是否同樣受到經濟發展程度和西方支持程度的制約。

關鍵詞：俄羅斯、前蘇聯、兩岸關係、權力不對等

\* \* \*

## 壹、前 言

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九一年，在歐亞大陸上面積最大、種族最複雜的國家就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簡稱蘇聯（Soviet Union）。蘇聯在解體之前是由十五個加盟共和國（Union Republics）所組成，其中最大的是俄羅斯。其他的十四個共和國在帝俄時代都是被沙皇所征服的歐亞民族，到了蘇聯時代由於列寧主張以種族為基礎的聯邦制，就以加盟共和國的形式加入了由共黨所建立和領導的新國家。蘇聯雖然強調各個共和國間的平等地位，然而事實上政治的權力中心還是在莫斯科，而俄羅斯人還是統治民族。只有到一九九一年蘇聯崩

\* 本論文原發表於民國八十六年一月十九日中國政治學會舉辦之八十五年度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解了以後，各民族才有機會真正建立主權獨立的國家。然而這些歐亞新興國家在地理上仍然和俄羅斯接壤，而俄羅斯繼承了蘇聯絕大部分的人口、土地、資源、經濟力量與軍事力量。莫斯科對於居住於這些國家的二千五百萬俄羅斯人常表現高度的關心，而俄國內部也不乏主張重建大俄羅斯的民族主義者。面對曾經統治了自己幾百年的強鄰，從塔林（Tallinn）到杜珊別（Dushanbe），各國的政治領袖們所必須思考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應該對莫斯科採取什麼樣的態度。這是一個攸關各國生死存亡的核心問題，其意義正如同兩岸關係對於臺灣的影響。

從結構上來說，前蘇聯各共和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與臺灣和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是類似的。兩者都是大小懸殊，尤其在軍事力量上相距甚遠。除了在傳統軍力上占絕對優勢之外，俄羅斯和中國大陸都是核子強權，分別對其周邊國家構成巨大威脅。哈薩克、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雖然在蘇聯解體時都擁有核武，但是一方面缺乏維護和使用的能力，一方面又受到莫斯科與西方國家的雙重壓力，被迫將境內的核武移交給俄羅斯，所以不是真正的核武國家。臺灣在若干武器系統的更新上迭有突破，但是就總體軍力而言，則落後中國大陸甚遠。在經濟力量方面，俄羅斯雖然在改革上遭遇了很多的困難，但是在其周遭的其他前蘇聯共和國大部分也都陷於經濟轉型的困局當中。從總體的角度來看，俄羅斯由於資源豐富、人口眾多、工業先進，所以對於鄰國仍然具有壓倒性的經濟優勢。在兩岸關係當中，臺灣固然在過去創造了經濟奇蹟，但是自從鄧小平主政以來，中國大陸的經濟卻以極高的速度成長，極有可能在廿一世紀初葉超越美國成爲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sup>①</sup>由於人口數目相差懸殊，所以大陸人均經濟指標的些微改善，在總量上就帶來巨大的增長，並且拉開了兩岸之間的距離。大陸對於臺灣經濟優勢已經形成，在長期來看，此種優勢只會不斷擴大。

北京對於臺北的主權要求是兩岸關係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sup>②</sup>即使在鄧小平「一國兩制」的規劃當中，對於主權的堅持也沒有稍作讓步。前蘇聯的情形在這裡似乎和兩岸關係不同，因爲俄羅斯政府從來沒有公開地主張要將其他的前蘇聯共和國併入俄羅斯，或是重建蘇聯。<sup>③</sup>但是這一類型的的主張卻是許多俄羅斯民族主義政黨的主要政見，例如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杜馬國會大選中獲得最多選民支持的自由民主黨黨魁

註① 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專家，後爲美國財政部次長的 Lawrence Summers，在一九九二年估計中國大陸的平均 GDP 是二千五百美元（以購買力平價爲基礎）。他預計大陸在二〇〇三年會超越美國。世界銀行在一九九六年的報告“Poverty in China: What Do the Numbers Say?”當中，則認爲大陸趕上美國的時間還要多花二十年。如果不用購買力平價來計算 GDP，而採用一般的匯率，則趕上美國的時間還會加倍到四十年。參見“How Poor is China?” *The Economist*, October 12~18, 1996, pp. 27~29.

註② Chih-cheng Lo and Jih-wen Lin, “Between Sovereignty and Security: A Mixed Strategy Analysis of Current Cross-Strait Interaction,” *Issues and Studies*, Vol. 31, No. 3 (March 1995), pp. 64~91.

註③ 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 *Russia and the New States of Eurasia: The Politics of Upheav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00; 雖然葉爾欽在掌權之初就明白表示關心居住在周邊國家俄羅斯人的安全，參見 James M. Goldgeier, “Balancing vs. Bandwagoning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92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September 3~6, 1992.

季里諾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和曾經擔任副總統的魯茨科伊（Aleksandr Rutskoi），就是激進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者。<sup>④</sup>在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的國會選舉之後，俄羅斯共產黨躍升為杜馬國會中的第一大黨，他們在黨魁朱岡諾夫（Gennadii Zyuganov）的領導之下，推動重建蘇聯的運動。在一九九六年三月十五日，國會中的共黨議員和自民黨合作，通過決議認定俄羅斯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在一九九一年年底解散蘇聯之舉是不合法的；而在當年的三月十七日蘇聯曾經舉行公民投票主張維持蘇聯，這個投票的結果也是有效的。<sup>⑤</sup>在由前蘇聯所分出的歐亞新興國家當中，對於和俄羅斯重新聯合的主張也不乏贊同者。在魯卡申科總統（Alyaksandr Lukashenka）帶領下的白俄羅斯就積極地謀求和俄羅斯合併，並且在一九九六年四月二日和葉爾欽總統簽下了聯合條約。從這些政治動作看起來，俄羅斯對於周邊的前蘇聯共和國實在具有準主權要求（quasi sovereignty claim）。<sup>⑥</sup>

北京對於臺北固然有主權要求，但是自從一九六〇年代以來，這個要求並沒有導致雙方的軍事衝突，它最大的表現是在外交的爭奪戰上，而它的解決也必然是長期性的。俄羅斯對周邊國家雖然只有準主權要求，但是由於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昂揚和重建蘇聯運動的興起，這些國家所感受到從莫斯科傳來的壓力絕不會小於臺北所感受到從北京傳來的壓力。因此從主權要求的這個角度來看，俄羅斯與周邊國家的關係與兩岸關係也具有相似的結構。

從以上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出來，俄羅斯和周邊的前蘇聯共和國是大小懸殊，國力差距極大的，大陸和臺灣也是。俄羅斯對周邊國家提出了具有侵犯性的主權要求，大陸對臺灣也是。因此我們可以說，俄羅斯與周邊國家的關係與兩岸關係具有相似的結構，也就是權力不對等與大國對小國的主權要求。這代表從前者當中所獲得的觀察與結論是我們理解後者很好的參考。當然，俄羅斯和周邊新興國家的關係模式並不能夠自動地適用到兩岸關係上來，對此我們仍然需要做個案的檢證。

在建立了兩種關係在結構上的相似性之後，我們可以專注於討論本文的核心問題：在強鄰的主權要求之下，小國如何應對？具體地來說，是什麼因素決定了小國對大國的「抗衡」（balancing）或是「扈從」（bandwagoning）策略？

註④ 季里諾夫斯基的擴張性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可以在他的傳記當中清楚地看出來。參見吉利諾夫斯基著，李惠生，盛世良等譯，俄羅斯的命運（*O sud' bakh Rossii*）（北京：新華出版社，一九九四）。

註⑤ 國家杜馬所持的觀點是，葉爾欽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八日所簽訂的「獨立國協」成立協議，並沒有獲得當時俄羅斯的最高權力機關「俄羅斯聯邦人民代表大會」的通過，因此是沒有效力的。「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在當年十二月十二日所做成的同意廢除蘇聯的決定是無效的。而在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七日的公民投票當中，俄羅斯的選民有七五·四％參與投票，其中有七一·三％贊成維持蘇聯。這個投票的結果對俄羅斯聯邦有拘束力。參見李玉珍，「俄羅斯對『獨立國協』政策的演變」，*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五卷第八期，民國八十五年八月，頁二六～三六；*CNN Interactive World News*, March 15, 1996.

註⑥ Yu-Shan Wu, "Theorizing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 Analogy with Russia and Its Neighbors," *Issues and Studies*, Vol. 31, No. 9 (September 1995), pp. 1~18.

## 貳、策略抉擇的基本條件與次要因素

當歐亞新興國家（也就是俄羅斯所說的近鄰，near abroad）從蘇聯獨立出來的時候，對於俄羅斯都是滿懷戒懼之心，深恐莫斯科會重新將它們納入勢力範圍，或甚至將其兼併。在這種恐懼的心態之下各國應該會積極整建軍備，或是極力尋求和西方的聯盟，也就是採取抗衡的策略。從實例中可以發現，有一些周邊國家確實對俄羅斯採取這種對抗的態度，而且能夠堅持不變。有一些國家在建國之初採取了抗衡的策略，但是後來卻逐漸妥協，開始對莫斯科的種種要求做出讓步。最後有一些周邊國家從一開始就決定了扈從的基本態度，而且始終維持一致。簡言之，環繞俄羅斯的歐亞新興國家有採取抗衡策略的，有採取扈從策略的，也有由抗衡轉化成扈從的。<sup>⑦</sup>

抗衡和扈從各有其利弊得失。抗衡較能堅持國家的獨立和主權，保證強鄰沒有辦法干涉本國內政，但是卻必須承擔高額的軍費支出與防衛承諾，以及冒著觸怒強鄰的風險。扈從可以免去對抗的代價，但是卻必須接受強鄰對於本身的各種限制，與失去主權的尊嚴。歐亞新興國家在決定它們對於莫斯科的態度時，必須在兩種策略中權衡輕重，有所抉擇。在這種相似的大環境當中，為什麼有些國家選擇了抗衡，有些選擇了扈從，而又有些先是決定了抗衡，而後又轉為扈從呢？

在檢視了各個歐亞新興國家的經濟社會條件之後，我們發現各國對莫斯科的態度基本上受到兩個條件的左右。第一個是各國的經濟發展程度，第二個是各國在西方所獲得的支持。一般而言，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以及比較受到西方重視的國家從一開始就採取抗衡的政策，而且能夠持續。另一方面，經濟發展程度較低以及較不受西方重視的國家，或是自始就採取扈從的態度，或是不能堅持抗衡，而逐漸轉成扈從。除了經濟發展和西方支持這兩個基本條件之外，國家的大小、俄裔在總人口當中所占的比重、文化差異和歷史經驗等都相當程度地影響了各國的對俄政策，但是這些因素都沒有經濟發展和西方支持這兩個基本條件來得重要。因此當國家大小等因素和基本條件衝突的時候，後者最終會決定各國的對俄政策。在以下的討論當中，我們先檢視一些次要因素，然後再分析經濟發展和西方支持這兩個基本條件。

### 一、次要因素

#### (一) 國家大小與國力強弱

在解釋各個歐亞新興國家對俄政策的時候，我們很自然會假設新興國家的版圖愈大、人口愈多、國力愈強，則愈容易採取抗衡的策略。這是因為一個較大的國家可以

註⑦ 這些態度上的不一致造成了「獨立國協」統合上的困難。哈薩克的總統納扎巴耶夫在一九九四年三月就指出獨立國協在當時已經通過了二七〇個決議，在這其中有些國家只批准了四十個，有些國家則批准了一五〇個，顯見各國對於統合的看法有很大的差距。參見 Martha Brill Olcott, "Sovereignty and the 'Near Abroad'," *Orbis*, Vol. 39, No. 3 (Summer 1995), pp. 353-368.



有比較足夠的資源來對抗莫斯科，而一個幅員小、人口少、國力弱的國家由於欠缺抗衡俄羅斯的條件，就只能採取扈從的策略。

根據這個推論，在俄羅斯周邊的新興國家當中最有可能採取強硬對俄政策的就是烏克蘭，<sup>⑧</sup>這是因為烏克蘭在蘇聯的各個共和國當中是僅次於俄羅斯的第二大國，占蘇聯國內生產總額的二五%到三〇%。<sup>⑨</sup>烏克蘭境內儲存了相當數量的核子武器，同時它的傳統軍事力量也有可觀之處。這個國家的資源豐富，人口僅次於俄羅斯，約為後者的三分之一（參見表一）。由於在國力上有這許多獨特的優勢，當烏克蘭從蘇聯

表一 蘇聯各共和國人口組成（1989普查）

	總人口	本族人 所占比例	俄羅斯人 所占比例	其他重要少數民族
哈薩克 (Kazakhstan)	16,463,115	40%	38%	日耳曼人6%，烏克蘭人5%，白俄羅斯人5%
拉脫維亞 (Latvia)	2,666,567	52%	34%	白俄羅斯人5%
愛沙尼亞 (Estonia)	1,565,662	62%	30%	
吉爾吉斯 (Kyrgyzstan)	4,257,755	52%	22%	烏孜別克人13%
烏克蘭 (Ukraine)	51,449,479	73%	22%	
摩多瓦 (Moldova)	4,322,363	64%	13%	烏克蘭人14%
白俄羅斯 (Belarus)	10,149,248	76%	13%	
土庫曼 (Turkmenistan)	3,512,190	72%	10%	烏孜別克人9%
立陶宛 (Lithuania)	3,673,262	80%	9%	波蘭人7%
烏孜別克 (Uzbekistan)	19,808,077	71%	8%	塔吉克人5%
塔吉克 (Tajikistan)	5,089,593	62%	8%	烏孜別克人24%
亞賽拜然 (Azerbaijan)	7,019,739	83%	6%	亞美尼亞人6%
喬治亞 (Georgia)	5,395,841	70%	6%	亞美尼亞人8%，亞賽拜然人6%
亞美尼亞 (Armenia)	3,304,353	94%	2%	

資料來源：Ian Bremmer and Ray Taras, eds., *Nation and Politics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550~560.

註<sup>⑧</sup> James M. Goldgeier, "Balancing vs. Bandwagoning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註<sup>⑨</sup> Bohdan Krawchenko, "Ukraine: the Politics of Independence," in Ian Bremmer and Ray Taras, ed., *Nations and Politics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75.

脫離出來的時候，確實是對莫斯科採取相當強硬的立場，可以說是抗衡的典型。一九九一年的十二月一日，烏克蘭舉行公民投票，確定要尋求獨立。在同時舉行的第一屆總統選舉當中，共黨候選人克拉夫區克（Leonid Kravchuk）也是以脫離蘇聯獲得選民的支持。烏克蘭的出走後來引起了一連串的連鎖反應，最後導致蘇聯的解體。

在蘇聯解體之後，基輔（Kiev）繼續抗衡莫斯科。不論在克里米亞半島的主權歸屬問題上、在黑海艦隊的分割方式上、或是在烏克蘭的核武政策上，克拉夫區克都和葉爾欽針鋒相對。然而烏克蘭的經濟狀況持續惡化，最後陷入危機當中。一九九四年新選出的總統庫其馬（Leonid Kuchma）遂改弦更張，開始對俄親善，逐漸將抗衡政策調整成半抗衡、半扈從的狀態。這種對俄政策的更張顯然無法從烏克蘭的國家大小來解釋。

烏孜別克是另外一個例子。這個中亞大國目前擁有二千三百萬人口，在各前蘇聯共和國中居第三位，僅次於俄羅斯和烏克蘭，土地面積和法國相當，資源豐富。<sup>⑩</sup>烏孜別克的首府塔什干（Tashkent）是蘇聯時代中亞的軍事和行政樞紐，也是飛機、巴士、拖拉機和煉油設備的製造中心，更是中亞的科技與人文薈萃之所。從國家能力的觀點來看，烏孜別克可以和俄羅斯與烏克蘭在歐亞新興國家當中鼎足而立，並列為三強。<sup>⑪</sup>然而，強盛的國力基礎並沒有使得塔什干採取抗衡莫斯科的政策。事實上從烏孜別克在一九九一年八月三十一日脫離蘇聯獨立的時候開始，塔什干就像中亞其他的國家一樣扈從莫斯科的政策。在這一點上烏孜別克和烏克蘭有很大的不同，也可以看出國家大小和國力強弱實在不能夠決定各國的對俄政策。

在各個歐亞新興國家當中，不僅大國未必抗衡俄羅斯，小國也未必扈從俄羅斯。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波羅的海三小國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它們的人口分別占歐亞新興國家中的倒數第一、第二和第五位，然而它們卻堅決地採取了抗衡俄羅斯的策略。在這三國當中，立陶宛最大，然而比較起來，維爾紐斯（Vilnius）和莫斯科的關係卻比塔林和里加（Riga）與莫斯科的關係要好。前蘇聯十五個共和國當中，最小的愛沙尼亞是所有俄羅斯周邊的新興國家當中最反俄的。因此無論是波羅的海國家之間比較起來，或是波羅的海國家和其他歐亞新興國家比較起來，都可以發現國家大小和國力強弱無法決定各國的對俄政策。<sup>⑫</sup>

## （二）俄裔人口的比重

從沙皇時期開始，俄羅斯人就大量地移居到帝國的各個區域，和當地的民族雜居。這個趨勢在蘇聯時期並沒有改變。因此到了一九九一年年底蘇聯解體的時候，總計

註⑩ 烏孜別克是世界上第三大的棉花輸出國，同時富藏黃金、鎢、錳、鈾和天然氣。

註⑪ S. Frederick Starr, "Making Eurasia Stable,"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 1 (January/February 1996), pp. 80~92.

註⑫ 當然，我們也沒有辦法在國家大小和國力強弱與各國的對俄政策之間建立相反的關係，就是國家愈大愈強則愈親俄，國家愈小愈弱則愈反俄。這種推論不但在邏輯上無法解釋，在實例上也無法普遍地證實。波羅的海國家表現的是一個特例，而不是通則。

有二千五百萬的俄羅斯人居住在十四個歐亞新興國家當中。依照一九八九年蘇聯最後一次人口普查的結果來看，俄裔占各國總人口當中的比例，在哈薩克是高達三八%，而在亞美尼亞則只有二%，差距極大（參見表一）。由於這些俄裔居民在過去帝俄和蘇聯的時代事實上是統治民族，如今在一夕之間成爲各國當中的少數民族，必須面對各國風起雲湧的民族主義和同化政策，所以在心理上有相當大的調適困難。站在莫斯科的立場，對於這些俄羅斯人的命運自然非常關心，所以俄裔人口就成爲各國和俄羅斯之間爭執的焦點。按照這個觀點來看，一個國家內部俄裔人口的比重愈大，和莫斯科的關係就愈緊張，對俄政策就愈趨向抗衡；在另一方面，一個國家俄裔人口的比重愈小，和莫斯科的關係就愈緩和，對俄政策就愈可能走向扈從。

這個理論確實可以適用於波羅的海國家。在波海三國當中，愛沙尼亞的俄裔占總人口的三〇%，拉脫維亞的俄裔占三四%，而立陶宛的俄裔只有九%。在這種情況之下，俄裔的政治權利成爲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與俄羅斯之間的衝突焦點。愛、脫二國自從獨立以來一意剷除帝俄和蘇聯時代俄羅斯統治的遺跡，獨尊本國語言文化，並且在公民法當中將種族和語言的因素訂爲公民權利的條件。莫斯科方面則聲稱此爲對俄裔的種族歧視，運用各種壓力要求塔林和里加讓步。但是立陶宛的俄裔由於人數較少，並不構成維爾紐斯和莫斯科之間的關係障礙。<sup>③</sup>一般而言，在波羅的海國家當中，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和俄羅斯的關係惡劣，兩國的對俄政策以抗衡爲主，立陶宛則較爲緩和，這種狀況和由俄裔人口多寡來推斷各國對俄政策的理論是相符的。

然而這種理論在運用到中亞國家時就出現問題了。在一九八九年哈薩克的總人口當中，俄裔占三八%，而哈薩克人也僅比俄裔多二個百分點，占四〇%。這是所有歐亞新興國家當中俄裔和本族人口所占比例差距最小的例子。在另外一個中亞國家吉爾吉斯，俄裔占總人口的比例是二二%，居全蘇聯的第五位。照說這樣高的俄裔人口應該會帶來強硬的對俄政策，然而哈薩克和吉爾吉斯卻是莫斯科最忠心的扈從者。這種狀況顯然打破了「俄裔人口比重愈高，該國對俄政策愈強硬」的假說。在表一當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在俄裔人口占總人口比例最高的前四名當中，有最強硬的抗衡者（第二名的拉脫維亞和第三名的愛沙尼亞），也有最馴服的扈從者（第一名的哈薩克和第四名的吉爾吉斯），更有從抗衡者逐漸轉變成半抗衡、半扈從的烏克蘭（也是第四名）。可見俄裔人口的比重和各國的對俄政策沒有絕對的關聯。

### （三）文化差距和歷史仇恨

另外一個被認爲和對俄政策有關的因素是各新興國家與俄羅斯的文化差距和歷史仇恨。依理，一個和俄羅斯文化差異極大，而在歷史上又飽受俄國欺凌的國家會在獨立之後對莫斯科採取抗衡的政策；而一個和俄羅斯同文同種，彼此在歷史上又沒有深仇大恨的新興國家則較有可能和莫斯科和睦相處，甚或採取扈從的態度。在解釋波羅的海國家抗衡俄羅斯的政策時，論者常指出三小國和俄國在種族與文化上差異極大，

註③ EIU Country Profile : Estonia, Latvia, Lithuania, 1995~1996, p. 49.



本就不易融合。再加上三國在戰間期曾經獲得獨立，但是在一九四〇年又被蘇聯併吞，因此與俄羅斯不共戴天。當戈巴契夫開始推動「公開性」和「民主化」的改革時，波海三國就不顧一切地追求獨立，並且終底於成。在另一方面，白俄羅斯在種族上是東支的斯拉夫人，在歷史上和大俄羅斯也沒有宿怨，因此可以推斷明斯克（Minsk）不會對莫斯科採取抗衡的策略，這確實符合事實。因此就波羅的海國家和白俄羅斯而言，文化歷史解釋似乎言之成理。

然而這個理論對於中亞國家卻不適用。雖然波海三國在種族、語言和宗教上和俄羅斯頗有差異，但是這些差異無論如何比中亞回教國家和俄羅斯的差異要小。沙俄在十九世紀對於中亞的征服充滿了血腥暴力，也因此帶來了世代綿延的民族仇恨。如果從文化歷史的角度來看，中亞應該比波海國家要更為反俄，然而實際狀況卻與此相反：波海三國是抗衡者，而中亞國家是扈從者。顯然歷史和文化無法有力地解釋各國的對俄政策。

如果國家的大小、俄裔在總人口當中所占的比重、以及文化差異和歷史經驗都不是決定各國對俄政策的根本原因，那麼究竟什麼才是呢？在以下的討論當中，我們將要進入本書主要的研究架構，探討各國的經濟發展程度和在西方所獲得的支持對各國選擇抗衡或扈從政策的影響。

## 二、各國的經濟差距

首先我們來了解一下歐亞新興國家經濟發展程度的差距。蘇聯是一個極其龐大的國家，它的十五個加盟共和國在發展程度上參差不齊。一般而言，位處西北的共和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程度較高，愈向東和向南則發展程度愈低。這個模式其實約略符合在歷史上整個歐洲的發展形態：開發程度由西北向東南遞減。基於此種了解，我們可以發現在前蘇聯的領域內除了俄羅斯之外共有四組國家，它們的發展程度各不相同。第一組是位於西北角的波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它們的國民所得居全蘇聯之冠。在經社發展條件上居於第二的是斯拉夫裔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以及羅馬尼亞裔的摩多瓦。這些國家雖然不若第一組的國家發達，但是卻和俄羅斯不相伯仲。第三組國家是南方外高加索的喬治亞、亞賽拜然和亞美尼亞。它們在蘇聯時代就平均國民所得來說超越中亞五國，但是自從蘇聯解體以來，它們卻比中亞各國遭遇了更大的經濟打擊，以致於現在排名在中亞之後。最後第四組的國家是東南方的中亞五國——哈薩克、土庫曼、烏孜別克、吉爾吉斯和塔吉克。這些國家向來是蘇聯最為落後的區域，到了一九九一年以後，它們仍然和外高加索三國一樣，居於發展的末列。

在表二當中，我們把俄羅斯周邊的國家依據它們人均 GDP 的高低（用購買力平價計算）加以順序排列。我們發現在一九九〇年的時候，第一組的波海三國都名列前茅，而第四組的中亞五國則殿後。在它們之間的是第二組（白俄羅斯第三，烏克蘭第六，摩多瓦第八）和第三組（亞美尼亞第七，喬治亞第九，亞賽拜然第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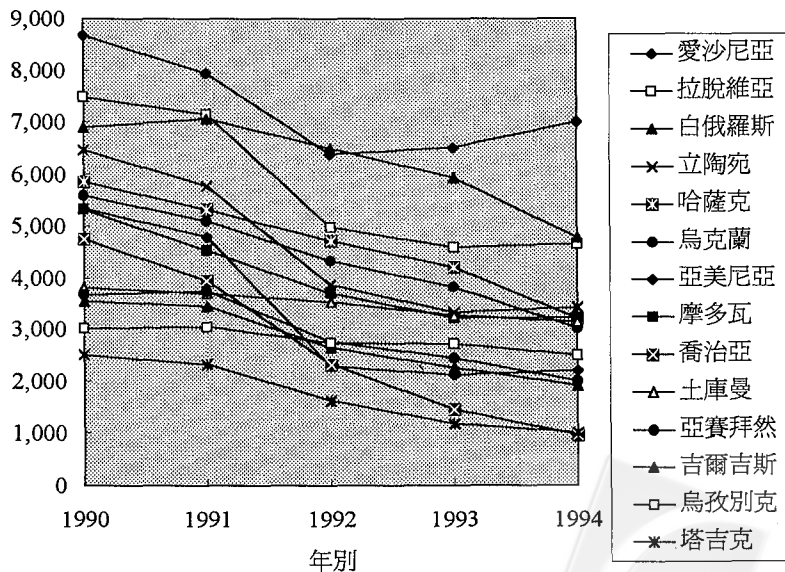
從一九九〇年到一九九四年，歐亞新興國家都經歷了嚴重的經濟危機，也都實行了或多或少的經濟改革。從人均 GDP 來看，各國的相對位置並沒有產生太大的變動

表二 歐亞新興國家的人均 GDP ( 購買力平價, US \$ ) : 1990~1994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0年 名次	1994年 名次	國家組別
愛沙尼亞	8,675	7,941	6,389	6,502	6,996	1	1	G1
拉脫維亞	7,481	7,157	4,993	4,593	4,658	2	3	G1
白俄羅斯	6,900	7,066	6,495	5,936	4,788	3	2	G2
立陶宛	6,462	5,784	3,868	3,323	3,424	4	4	G1
哈薩克	5,848	5,334	4,718	4,217	3,212	5	6	G4
烏克蘭	5,590	5,107	4,344	3,822	3,015	6	8	G2
亞美尼亞	5,339	4,798	2,299	2,119	2,207	7	10	G3
摩多瓦	5,332	4,532	3,695	3,222	3,218	8	5	G2
喬治亞	4,762	3,950	2,325	1,450	953	9	14	G3
土庫曼	3,815	3,707	3,527	3,267	3,145	10	7	G4
亞賽拜然	3,664	3,749	2,755	2,454	1,999	11	11	G3
吉爾吉斯	3,554	3,460	2,647	2,261	1,899	12	12	G4
烏孜別克	3,020	3,054	2,737	2,720	2,490	13	9	G4
塔吉克	2,509	2,319	1,623	1,170	1,010	14	13	G4

資料來源：EIU Country Report : Russia , First Quarter 1996 , pp. 42, 43.

圖一 歐亞新興國家人均 GDP 的變動：1990~1994



資料來源：同表二



。在圖一當中我們可以看出，代表各國人均 GDP 的曲線大都是水平向下移動，表示生活水準同步降低。從四組國家分別來看，波羅的海三國在實行經濟改革和應付經濟危機上面表現最佳，因此到了一九九四年仍然在四組中維持領先的地位。在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摩多瓦等西方三國當中，只有烏克蘭的經濟水平和其他新興國家比較起來相對降低。南方的外高加索三國在一九九〇到一九九四這五年當中，除了經濟危機外還飽經戰亂，所以人均 GDP 的相對降幅較大，尤其喬治亞更落到十四國之末。在中亞五國當中，哈薩克、塔吉克和吉爾吉斯的生活水平固然急速地震盪向下，但是土庫曼和烏孜別克卻獨一無二地保持了原有的生活水準，使得它們的相對地位提高。然而此一現象並不是由於這兩個中亞國家已經成功地進行了經濟改革，而是正巧相反，土庫曼和烏孜別克盡量推遲經濟改革，所以也就推遲了因為經改所帶來的副作用。但是在國內和國際的巨大壓力之下，經改還是不可避免，所以這兩個國家人均 GDP 的劇烈下降將在其他國家從谷底翻升後出現。

總體來看，歐亞新興國家的生活水平在經歷了蘇聯解體後的經濟危機與經濟改革之後，基本上仍然維持蘇聯時代的相對地位。在一九九〇年，波海三國人均 GDP 的平均數是七、五三九美金，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摩多瓦等西部三國的平均數是五、九四一美金，外高加索三國是四、五八八美金，而中亞五國是三、七四九美金。到了一九九四年，波海三國的平均數跌落到五、〇二六美金，西部三國降到三、六七四美金，外高加索只有一、七二〇美金，而中亞則為二、三五一美金。這樣看起來，在前蘇聯的領域內生活水平還是由西北向東南遞減。此一基本的經濟狀態相當程度地決定了各國對於莫斯科究竟是採取抗衡或是扈從的策略。

### 三、西方的接納

除了經濟的差距之外，西方對於歐亞新興國家的接納程度是另外一個決定各國採取抗衡或扈從政策的主要原因。這個國際環境的因素剛好和經濟的因素相互增強。一般而言，愈偏西北的國家，傳統上和西方的互動愈多，在獨立後接受西方的民主與市場體制的程度也愈深，也因此就愈為西方所接納。這些剛巧就是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另一方面，愈偏東南的國家，傳統上和西方的互動愈少，在獨立後接受西方的民主與市場體制的程度也愈淺，也因此就愈和西方疏遠。這些剛巧就是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之下，偏處西北的國家由於有較發達的經濟做支撐，又有西方做奧援，在對俄關係上便可採取抗衡的策略；而偏處東南的國家由於在經濟上較落後，需要靠莫斯科的協助，在對外關係上又得不到西方的支持，所以便只有對俄羅斯採取扈從的策略。

我們可以從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接受各個前蘇聯共和國入會申請的情況，看出西方對於這些國家接納的程度。歐洲理事會在眾多的歐洲國際組織當中具有較高的理想主義。自從於一九四九年成立以來，它一直扮演著推動民主、保障人權的角色。歐洲理事會的原始會員國是比利時、丹麥、法國、英國、荷蘭、愛爾蘭、義大利、盧森堡、挪威和瑞典。在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九年之間，歐洲理事會接納了土耳其

其（1949）、希臘（1949）、冰島（1950）、德國（1951）、奧地利（1951）、賽普勒斯（1961）、瑞士（1963）、馬爾他（1965）、葡萄牙（1976）、西班牙（1977）、列支敦斯登（1978）、聖馬利諾（1988）和芬蘭（1989）等國人會，其間並且因為希臘和土耳其的軍人干政而對之採取不同的停權處分。<sup>④</sup>從歐洲理事會接納新會員國的情況看起來，只有滿足西方民主和人權標準的國家才得以入會（因此如葡萄牙和西班牙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後期民主化之後才得以入會）。另外從歐洲理事會所通過的文件和決議與頒發的獎項看起來，歐洲理事會是西方的道德論壇，良心標的，只有通過它的檢驗，申請國才能夠真正融入歐洲的大家庭。

自從一九八九年東歐和蘇聯產生了一連串的民主變革，出現了一批新興國家。這些國家都想藉著加入歐洲理事會來進入歐洲的大家庭。結果到一九九六年二月為止，在新加入的會員國當中，只有東歐國家和前蘇聯第一組的波羅的海三國與第二組的摩多瓦和烏克蘭，至於第三組（外高加索）和第四組（中亞）各國則均未列名（參見表三）。這種情況充分地顯示西方只願誠心地接納前蘇聯國家當中位置偏西偏北，和西

表三 歐洲理事會擴大組織的過程（1990～1996）

入會順序	國名	入會時間	國家分類
1	匈牙利	1990	東歐
2	波蘭	1991	東歐
3	保加利亞	1992	東歐
4	愛沙尼亞	1993	前蘇聯第一組
5	立陶宛	1993	前蘇聯第一組
6	斯洛文尼亞	1993	東歐
7	捷克	1993	東歐
8	斯洛伐克	1993	東歐
9	羅馬尼亞	1993	東歐
10	安道爾	1994	其他
11	阿爾巴尼亞	1995	東歐
12	拉脫維亞	1995	前蘇聯第一組
13	摩多瓦	1995	前蘇聯第二組
14	烏克蘭	1995	前蘇聯第二組
15	馬其頓	1995	東歐
16	俄羅斯*	1996	前蘇聯

\* 俄羅斯在一九九二年就申請加入，直至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才正式入會。雖然歐洲委員會並不滿意俄羅斯的人權狀況，但是為了鼓勵俄羅斯推行民主，所以破例允許入會。

資料來源：洪茂雄，「歐洲理事會擴大組織的背景與意義」，美歐月刊，第十一卷第八期，民國八十五年八月，頁一〇六。

註④ 洪茂雄，「歐洲理事會擴大組織的背景與意義」，美歐月刊，第十一卷第八期，頁一〇六。



歐傳統上互動密切，而且在政治與經濟制度轉型上較為成功的國家。在表三當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東歐國家較前蘇聯的共和國更容易為西方世界所接納，原因和波羅的海國家較中亞容易為西方所接納一樣，都是傳統上和西方互動較密切，西化較深，制度轉型較成功。而造成此一現象的基本原因是在地緣上東歐比蘇聯接近西方。也就是因為這一點，在北約第一波的擴張計畫當中，波蘭、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可能會被列入考慮，但是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則沒有加入的可能。

在前蘇聯的共和國當中，不僅只有第一組和第二組的國家能夠進入歐洲理事會成為會員，從入會的時間上來觀察，更可以看出波海三國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較第二組的烏克蘭與摩多瓦入會要早。在這裡也可以看出西方實在是對波海三國獨有厚愛。在歷史上，愛沙尼亞和芬蘭親近，拉脫維亞與瑞典友善，而立陶宛則長期與波蘭聯合。這三個國家和歐洲之間的關係超越任何其他的前蘇聯共和國。這些歷史紐帶就成為波海三國追求抗衡莫斯科政策的基礎。

在討論過了經濟發展程度的差距和西方不同的接受程度之後，我們現在可以開始具體地討論各個前蘇聯共和國對俄政策的模式。首先我們將要分析各國脫離蘇聯獨立的時間，這是日後對俄政策的先聲；然後我們再逐一地分析各國的對俄政策。

### 叁、宣布獨立的時間

蘇聯的解體是各個加盟共和國相繼宣布獨立的結果。在這裡各國宣布獨立的時間代表了很重大的意義。對於急於想從蘇聯脫離的國家而言，當莫斯科的統治力量逐漸減弱之後，無不儘快宣布獨立。而對於仍然想留在蘇聯之內的國家而言，宣布獨立實在是不得已之舉。我們從表四當中可以看出來，從立陶宛在一九九〇年三月就宣布獨立到哈薩克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才宣布獨立，期間有一年又九個月的差距。在這一段期間當中，東歐國家一個接著一個地實行民主制度，蘇聯的政治局面快速變化，莫斯科對各地的控制力量不斷式微。此時究竟應該留在蘇聯內部，但是爭取一個較為平等的地位，還是完全從蘇聯脫離，就成為加盟各共和國所必須面對的重大決定。在表四中我們又可以看到，蘇聯的保守派在一九九一年八月所發動的政變是一個重大的分水嶺。凡是在政變前就宣布獨立的都是和莫斯科關係惡劣，急於求去的加盟共和國；而在政變之後才求去的則多是本來無意脫離蘇聯，但是由於受到政變的影響才宣布獨立。各國宣布獨立的時間顯示了它們和莫斯科的關係，也預示了各國在獨立後對於抗衡或扈從政策的選擇。

蘇聯各個加盟共和國的獨立可以從兩個制度性的因素中尋求解釋。首先是戈巴契夫的政治改革。戈巴契夫推動「公開性」和「民主化」政策的原意是在打擊共黨內部反對他的保守派，以推動「重建」，<sup>⑤</sup>但是實質上卻產生了激化蘇聯民族問題的副作

註⑤ Yu-Shan Wu, "Nationalism, Democratization, and Economic Reform," paper delivered at the 1993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2~5, 1993.



表四 各國宣布獨立的時間

國家	組別	宣布獨立日期
立陶宛	G1	3/11/90
愛沙尼亞	G1	3/3/91
喬治亞	G3	4/9/91
拉脫維亞	G1	8/21/91
一九九一年八月政變（十九至廿一日）		
亞賽拜然	G3	8/23/91
亞美尼亞	G3	8/23/91
烏克蘭	G2	8/24/91
白俄羅斯	G2	8/25/91
摩多瓦	G2	8/27/91
烏孜別克	G4	8/31/91
吉爾吉斯	G4	8/31/91
塔吉克	G4	9/6/91
土庫曼	G4	10/27/91
哈薩克	G4	12/16/91

資料來源：Martin Gilbert, *Atlas of Russian History* (N. Y.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58.

用。⑥結果戈巴契夫雖然在黨內的政治鬥爭當中獲得勝利，⑦但是各共和國的分離和獨立運動卻風起雲湧，一發不可收拾，大出戈巴契夫的意料之外。⑧在這個過程當中，最重要的關鍵點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全國人民代表選舉與一九九〇年的各共和國人民代表選舉。這兩個選舉並不是多黨競爭，但是由於面對差額選舉的壓力，各候選人無不向最能夠吸引票源的民族主義靠攏。於是分離主義和獨立運動聲勢大漲，甚至獲得了一些加盟共和國共黨領導階層的支持。這個現象在波海三國最為明顯，由於面對強大分離主義運動的挑戰，三國的共黨被迫疏遠它們和莫斯科的關係以爭取選票。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其他的共和國當中。

造成蘇聯解體的另外一個制度性的因素就是列寧在一九二〇年代所建立的聯邦制度。這個制度在形式上充分尊重蘇聯各民族的權利，包括設置以當地主要民族為名的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等，並且在各共和國中獨尊主要民族（titular nationalities）的語言和文化，給予主要民族特殊的政治權利（包括領導階層的人士安排），甚至賦予加盟共和國退出蘇聯的權利。然而，由於共產黨的控制是高度中央集權的，所以蘇聯的種族聯邦制（ethnic federalism）只有聯邦制的形式，而沒有實質。由大俄羅斯

註⑥ 吳玉山，*共產世界的變遷：四個共黨政權的比較*（臺北：東大，民國八十四年），第四章。

註⑦ 詳情參見 Stephen White, *Gorbachev and Af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aps. 1, 2.

註⑧ 參見 Gail W. Lapidus, "Gorbachev's Nationalities Problems," in Alexander Dallin and Gail W. Lapidus, eds., *The Soviet System in Crisis*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1).

人所掌控的聯共中央和蘇聯政府事實上號令全國，實行極權統治。對於各加盟共和國的主要民族而言，這種聯邦制提供了它們發展民族意識的政治和文化環境，又提供了現成的領域基礎和民族人口優勢，等於是創造了民族主義和分離運動的充分基礎。<sup>①</sup>但是另一方面，聯共的一黨專政又在實質上扼殺了各民族充分發展的機會。因此蘇聯的聯邦制造成了各民族理想和現實之間巨大的落差，帶來了強烈的相對剝奪感。<sup>②</sup>這種挫折和不滿在戈巴契夫的政治改革運動中得到了發洩的機會，最後終於造成了蘇聯的分崩離析。

蘇聯各個加盟共和國的獨立和聯盟的解體是在種族聯邦制與戈巴契夫政治改革的制度環境下發生的。<sup>③</sup>然而這兩個條件是一般性的，也就是所有的加盟共和國都面臨到相同的制度結構，它們沒有辦法解釋為什麼有些共和國急於求去，有些共和國卻又對蘇聯眷戀不捨。事實上，聯邦制和政治改革帶來了各國的獨立運動，但是卻不能決定獨立運動的強弱，而後者才是解釋宣布獨立時間的關鍵。

各國獨立運動的強弱基本上是兩個因素交互運作的結果。第一個是各民族原生性的差異（primordial differences），第二個是社會價值分配的不公平。當蘇聯各少數民族將自身在政治，經濟或文化上所處的劣勢地位歸諸於種族歧視時，他們的民族主義情緒便昂揚起來。<sup>④</sup>由於蘇聯各民族間的原生性差異實在太大，所以雖然有移民、通婚和雜居等交流的過程，但是各族人民間仍然有明顯的不同，同化的程度有限。另一方面，快速的現代化帶來的不僅是社會流動，也造成分配不均。位在西北較富裕的共和國（主要是波海三國）抱怨莫斯科將他們的資源汲取去貼補南方較窮困的共和國；而後者則抱怨莫斯科對它們沒有適當照顧，強迫它們接受對自身發展不利的生產分

註① 參見 Ronald G. Suny, "State, Civil Society and Ethnic Cultural Consolidation in the USSR: Roots of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Alexander Dallin and Gail W. Lapidus, eds., *The Soviet System in Crisis*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1).

註② Zigniew Brzezinski, "Post-Communist Nationalism," *Foreign Affairs*, Vol. 68, No. 5 (1989/90), pp. 1~10.

註③ 關於蘇聯解體的完整解釋，參見吳玉山，*共產世界的變遷：四個共黨政權的比較*。

註④ 關於民族和民族主義的定義，參見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關於民族主義的概念在歷史上的發展和與現代化的關係，參見 Hedva Ben-Israel, "National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5, No. 2 (Winter 1992), pp. 367~397；Alexander J. Motyl, "The Modernity of National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5, No. 2 (Winter 1992), pp. 307~323；關於用種族的因素來詮釋民族主義的起源，參見 Anthony Smith,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83), pp. ix~xli；關於用分配不均來解釋民族問題的起源，參見 David Laitin, "The National Uprisings in the Soviet Union,"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1 (1991), pp. 139~177；關於聯邦主義和領土基礎對民族問題的影響，參見 Ronald G. Suny, "State, Civil Society and Ethnic Cultural Consolidation in the USSR: Roots of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Alexander Dallin and Gail W. Lapidus, eds., *The Soviet System in Crisis*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1)；關於將種族因素和分配因素合併考慮，參見吳玉山，「蘇聯與南斯拉夫的解體及其對北約的影響」，*美國月刊*，第七十七期，民國八十一年九月，頁四~一八。

工（例如烏孜別克就成爲生產棉花的大本營），錯失了經濟成長的契機。在政治上，雖然各共和國名義上是由本族人統治，但是實際權力卻是集中於由俄羅斯人所擔任的第二書記手中。在莫斯科的中央政府也是由俄羅斯人所宰制。在這裡我們可以發現，各民族間的原生性差異和分配的不均勻是相互增強的，而分配的不均又是決定各國民族主義和獨立傾向強弱最重要的一個變項。以這個背景作爲基礎，再加上聯邦制的政治體制與戈巴契夫的公開性與民主化，各個共和國的獨立運動才爆發出來。

從實例上來看，獨立運動是先在波海三國展開。由於聲勢浩大，三國的共黨很快就調整了對莫斯科的態度，而向民族主義的旗幟靠攏。由於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長久以來是蘇聯生活水準最高的地區，當地人民對於聯邦在各共和國間的重分配政策早就積蓄了不滿的情緒。更由於三國地處蘇聯西北，和西方最爲貼近，更容易嚮往西方國家的生活水平，認爲一旦脫離蘇聯就可以擺脫落後，回到歐洲的大家庭。這種狀況就好像斯洛文尼亞（Slovenia）是南斯拉夫聯邦中最發達的區域，在聯邦制和政治民主化的浪潮中也是第一個高舉獨立大纛的國家。<sup>②</sup>簡言之，波海三國由於本身的經濟發展程度最高，所以認定脫離蘇聯可以大規模地改善它們的物質境遇，而與西方同步。這是其他的少數民族共和國所不曾考慮的因素，也是波海三國成爲蘇聯各民族獨立運動前鋒的原因。在一九八八年，波海三國的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s）崛起，並在一九八九年的人民代表選舉當中獲勝，當地的共黨領導階層被迫向民族主義轉向，獨立運動的火種也一路延燒到白俄羅斯和摩多瓦等第二組的國家，然後又發展到喬治亞。

同樣的聯邦制度，同樣的政治改革，同樣（或者更巨大）的民族差距，在中亞國家卻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影響。莫斯科的統治在中亞並非沒有遭遇到挑戰，事實上蘇聯族群危機第一個爆發點就是在中亞的哈薩克。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戈巴契夫撤換了哈薩克的共黨第一書記庫那耶夫（Dinmukhamed Kunayev），而代之以俄羅斯人科爾賓（Gennadii Kolbin），結果造成哈薩克首府阿拉木圖（Alma Ata，獨立後改名爲Almaty）的大規模群眾抗議事件。這是戈巴契夫上台後所遭遇的第一個民族問題。到一九八八年，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兩個外高加索共和國爲了那戈羅—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gh）的歸屬問題爆發激烈的戰鬥。這場蘇聯的共和國之間規模最大的武裝衝突之所以爆發，就是因爲居住在那戈羅—卡拉巴赫的亞美尼亞人受到戈巴契夫改革的鼓舞，想要脫離亞塞拜然的統治，歸入亞美尼亞的版圖。<sup>③</sup>然而，不論是哈薩克的群眾抗議，或是亞塞拜然與亞美尼亞之間的戰爭，其目的都不是脫離蘇聯。獨立運動在波海三國風起雲湧，在中亞五國卻沈寂無聲，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便是中亞對於莫斯科的經濟依賴。

中亞五國對於蘇聯所賦予它們的分工並不滿意，然而它們卻了解莫斯科運用直接

註② Veljko Vujacic and Victor Zaslavsky, "The Causes of Disintegration in the USSR and Yugoslavia," *Telos*, No. 88 (1991), pp. 120~140.

註③ Ronald G. Suny,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33.

的補助或是優惠的貿易條件（包括廉價的能源供應）將大量的資源由蘇聯的其他區域移轉到中亞來。從表二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中亞在一九九一年的時候是蘇聯各少數民族共和國當中最貧窮的一組國家，在這種情況之下脫離蘇聯無異是徒增本身的經濟困難。所以對中亞五國而言，獨立不是它們所追尋的目標，而是一個不利的結局，應該是能免則免的。◎

波羅的海國家深恐蘇聯的重分配政策會損傷本國的經濟利益，而中亞國家則依賴莫斯科的補助以維持現有的生活水平，造成這兩種不同狀況的原因是這兩組國家在經濟發展程度上有巨大差距。面對此種發展的差距，站在莫斯科的立場自然會將資源由西北向東南調動，也因此使波海國家急於脫離蘇聯，而中亞諸國則緊緊地依賴莫斯科。這兩種不同的中央和地方關係明顯地反映在各少數民族共和國宣布脫離蘇聯的不同時間之上。在表四中我們發現，波海三國（第一組）都在一九九一年八月保守派政變發生前或政變當時宣布脫離蘇聯；而中亞五國（第四組）則盡量推遲宣布獨立的時間，其中哈薩克是在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三國決定埋葬蘇聯後才宣布脫離的，結果中亞五國成爲所有蘇聯少數民族共和國當中最後獨立的。波海三國因爲經濟的考慮而急於求去，中亞諸國則同樣因爲經濟的考慮而對蘇聯眷戀不捨。在脫離莫斯科這一點上，各國態度最終是由本國的經濟發展程度和本國的經濟需求所決定。

## 肆、抗衡抑扈從：十四共和國的對俄政策

基本上，歐亞周邊國家對待俄羅斯的態度和當年它們脫離蘇聯的模式是直接相關的。如果一個少數民族共和國在一九九〇年和一九九一年蘇聯崩解的時候急於求去，那麼它在獨立之後便傾向於對俄羅斯採取抗衡的政策。如果它在當年對蘇聯眷戀不捨，則在獨立後便容易對俄羅斯採取扈從的態度。從上節的分析當中，我們發現波海三國由於生活水平高，所以領先宣布脫離蘇聯。而它們在獨立後也對俄羅斯不假辭色，聯合西方加以抗衡。在另一方面，中亞五國由於需要蘇聯的補助，所以遲遲不願意從聯邦中脫離。在蘇聯解體後，它們仍然對俄羅斯採取扈從的態度。

除了波海三國和中亞五國這兩組非常清楚的例子之外，經濟發展程度上介於其間的西部三國（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摩多瓦）與外高加索國家（喬治亞、亞塞拜然與亞美尼亞），在一開始的時候多追隨波羅的海國家主動從蘇聯脫離，但是在獨立後由於受到經濟的壓力，又無法獲得西方國家的支持，所以紛紛改變對於俄羅斯的態度，由抗衡逐漸轉成扈從。以下我們將對這四組國家逐一進行分析。

### 一、波海三國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是蘇聯境內少數民族從事獨立運動的先鋒，他們抗

註◎ Kirill Nourzhanov and Amin Saikal, "The New Kazakhstan: Has Something Gone Wrong?" *The World Today*, Vol. 50 (December 1994), pp. 225~229.



衡莫斯科的態度也最絕決。在一九九一年一月蘇聯的特種部隊開進維爾紐斯，強行鎮壓波海國家的獨立運動，造成轟動國際的事件。接下來在三月十七日蘇聯舉行了有關聯盟存廢的公民投票，波海三國與摩多瓦、喬治亞和亞美尼亞拒絕參加，顯示了堅強的獨立意志。⑥在此種狀況之下，戈巴契夫了解到想要挽回波羅的海國家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他所構思的新聯盟條約當中，並不打算包含愛、沙、立三國。在八月政變過後，蘇聯的中央形同肢解，再也擋不住波海國家的獨立浪潮。到了九月六日，莫斯科宣布承認愛、沙、立三國的獨立，正式放棄了挽回的努力。⑦

### （一）愛沙尼亞

波海三國在獨立後基本上都採取了抗衡俄羅斯的政策，其中尤以愛沙尼亞為然。這個蘇聯最小的共和國在獨立前擁有全蘇最高的生活水平，在獨立後困難的經濟改革期間也維持了此一領先的地位。在一九九一到一九九四年之間，愛沙尼亞的年平均通貨膨脹率是三五四·三%，在各個前蘇聯共和國之中是第二低的（參見表五）。愛沙尼亞又是最先脫離盧布建立本國貨幣（克隆，kroon）的國家。這個重大的貨幣改革是在一九九二年六月驟然實施，當時並沒有任何緩衝期。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曾經反對這種激進的政策，但是愛沙尼亞事後證明自己有穩定本國貨幣的能力。⑧由於愛沙尼亞的出口有競爭力，對外貿易大體維持均衡，又嚴格限制中央銀行發行貨幣的數量要由外匯儲備增加的速度決定，所以從一九九三年十月到一九九六年一月，克隆的匯率非常穩定，僅在一二·九比一美元到一一·六比一美元之間微幅震盪（參見表六）。愛沙尼亞的經濟改革起步最早、程度也最深，⑨由於本身的基本條件優越，又早已和西方建立了市場聯繫，所以在轉型期當中仍然能夠維持相當穩定的經濟局面。⑩

由於愛沙尼亞有成功的經濟改革做支撐，所以塔林不至於因為經濟的困難而向莫斯科的壓力屈服。雖然愛沙尼亞的內閣更迭次數頻繁，但是歷任政府基本上都是採取抗衡莫斯科的政策。自從獨立以來，在愛沙尼亞和俄羅斯兩國之間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居住在愛沙尼亞境內的俄裔少數民族。在二次大戰之後，愛沙尼亞的俄裔人口比重從不到八%上升到三〇%，引起愛沙尼亞人很大的憤怒。結果在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日第一次的自由選舉當中，俄裔被剝奪了投票權。接下來在愛沙尼亞的公民法和國籍法當中，又規定只有通過愛沙尼亞語言測驗者才能有公民權，而任何非愛沙尼亞裔的居

註⑥ Stephen White, *Gorbachev and After*, p. 174.

註⑦ 在一九九〇年一月一日莫斯科就已經給予波海三國經濟自主權，但還是堅持政治的控制。參見 William S. Brown, "Economic Transition in Estonia,"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Vol. 27, No. 2 (June 1993), p. 493.

註⑧ 愛沙尼亞甚至訂定法律將克隆和德國馬克的匯率定在EEK8:DM1的位置，參見 William S. Brown, "Economic Transition in Estonia," p. 496.

註⑨ 愛沙尼亞的經濟改革從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日就開始，早於其他前蘇聯共和國。

註⑩ Wolfgang Drechsler, "Estonia in Transition," *World Affairs*, Vol. 157, No. 3 (Winter 1995), p. 111.



表五 歐亞新興國家轉型期的通貨膨脹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1~94 平均	國家組別
拉脫維亞	n/a	262.4	958.1	34.7	26.3	23.5 <sup>b</sup>	320.4	G1
愛沙尼亞	17.2	210.6	1,069.3	89.4	47.7	28.4 <sup>a</sup>	354.3	G1
立陶宛	n/a	224.8	1,020.5	409.2	45.0	39.0	491.6	G1
摩多瓦	4.2	98.0	1,276.0	837.0	108.0	23.8	579.8	G2
吉爾吉斯	3.0	85.0	854.6	1,208.7	87.2	n/a <sup>g</sup>	606.6	G4
烏孜別克	3.1	106.0	527.7	857.1	1,314.0 <sup>i</sup>	n/a <sup>j</sup>	701.2	G4
亞賽拜然	8.0	106.0	616.0	1,130.0	1,664.0	n/a <sup>f</sup>	879.0	G3
塔吉克	4.0	112.0	1,157.0	2,195.0	341.0	120.0 <sup>c</sup>	951.3	G4
白俄羅斯	5.0	84.0	969.0	1,188.0	2,220.0	250.0 <sup>c</sup>	1,115.3	G2
哈薩克	4.2	90.9	1,513.0	1,571.0	1,900.0	180.0 <sup>c</sup>	1,268.7	G4
土庫曼	4.6	103.0	493.0	3,102.0	2,400.0	n/a <sup>h</sup>	1,524.5	G4
烏克蘭	n/a	91.2	1,445.3	5,500.0	891.0	375.0	1,981.9	G2
亞美尼亞	10.0	100.0	825.0	3,732.0	5,273.0	20.0 <sup>e</sup>	2,482.5	G3
喬治亞	5.0	131.0	1,463.0	7,492.0	7,380.0 <sup>d</sup>	n/a	4,116.5	G3

a : 1995年10月和去年同期比較

b : 1995年11月和去年同期比較

c : EIU 估計

d : 根據 IMF 的估計為10,000%

e : 1995年前十月

f : 1995年的前9個月當中，每月平均通貨膨脹率降至1.5%

g : 到1995年7月通貨膨脹率降至0.4%，或年率37.7%

h : 在1995年5月通貨膨脹率為5.7%，或年率1,688%

i : IMF 估計

j : 在1995年上半年平均每月通貨膨脹率為9.8%

資料來源：EIU Country Profile : Estonia, Latvia & Lithuania, 1995~1996, pp. 18, 39, 57 ; EIU Country Profile : Ukraine, 1996~1997, p. 19 ; EIU Country Profile : Belarus & Moldova, 1995~1996, p. 13, 40 ; EIU Country Profile : Georgia, Armenia, Azerbaijan, 1995~1996, pp. 18, 42, 43, 61 ; EIU Country Profile : Kazakhstan, Kyrgyzstan, Tajikistan, Turkmenistan, Uzbekistan, 1995~1996, pp. 15, 16, 43, 70, 89, 116.

表六 歐亞新興國家轉型期的通貨膨脹

	1993年 10月4日	1994年 1月3日	1994年 7月4日	1995年 1月6日	1995年 7月3日	1996年 1月5日	是否在盧 布區內
愛沙尼亞 (Kroon)	12.9	13.9	12.61	12.49	11.1	11.6	no
拉脫維亞 (Lats)	0.61	0.59	0.55	0.55	0.51	0.54	no
立陶宛 (Litas)	4.23	3.9	4	4	4	4	no
烏克蘭 (Karbovanets)	16,826.9	31,849.7	44,500	104,837	142,693	179,900	no
白俄羅斯 (Rubel)	n/a	5,663	27,350	11,195	11,500	11,500	yes
摩多瓦 (Leu)	2,041.7	3.6	4.05	n/a	4.54	4.53	no
亞美尼亞 (Dram)	n/a	100	310.1	403.57	408.2	402	no
喬治亞 (Coupon)	22,450	132,275	1,000,000	n/a	1,300,000	1.17	no
亞賽拜然 (Manat)	n/a	n/a	995	n/a	4,395	4,440	no
哈薩克 (Tenge)	n/a	7.52	45	n/a	63.6	64.3	no
吉爾吉斯 (Som)	6.7	9.15	11.3	n/a	10.6	10.95	no
烏孜別克 (Som)	n/a	n/a	7	n/a	30.25	34.6	no
土庫曼 (Manat)	n/a	24	n/a	n/a	230	2,100	no
塔吉克 (Tajikistanrouble)	1,164.9	1,239.2	2,008.5	3,880	51	300	yes
俄羅斯 (Rouble)	1,164.9	1,239.2	2,008.5	3,880	4,548	4,674	yes

資料來源：EIU Country Report : Russia, First Quarter 1996, p. 41.

民都必須向政府申請公民權或居住權，否則就必須離開愛沙尼亞。④這一類歧視俄裔的政策被莫斯科視為「種族隔離」(apartheid)和「種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並且用盡一切手段(包括切斷能源的供應，和延緩俄軍從愛沙尼亞撤離的時間等)

註④ EIU Country Profile : Estonia, Latvia, Lithuania, 1995~1996, p. 8.

來迫使愛沙尼亞屈服。在一九九五年二月愛沙尼亞國會 ( Riigikogu ) 決議要求政府承認車臣 ( Chechnia ) 獨立，更使雙方關係雪上加霜。在一九九六年三月，愛沙尼亞國會又對車臣游擊隊表示支持，而俄羅斯的杜馬國會則要求葉爾欽總統為愛沙尼亞歧視俄裔而對塔林實行經濟制裁。<sup>②</sup>在四月和五月，愛沙尼亞與俄羅斯相互驅逐對方的外交人員。<sup>③</sup>在這些衝突的場合當中，愛沙尼亞的總統莫利 ( Lennart Meri ) 扮演了一個緩和雙方緊張關係的角色，但是他並沒有改變塔林政府反俄的基調。愛沙尼亞很明顯地是對俄羅斯採取抗衡的態度。

## (二) 拉脫維亞

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的情況類似，都是藉著較高程度的經濟發展以及與西方的緊密關係來抗衡俄羅斯。像愛沙尼亞一樣，拉脫維亞的人均 GDP 在前蘇聯共和國當中名列前茅 ( 在一九九一年居第二位 )，並且成功地實行了經濟改革。雖然在轉型期當中經濟有顯著的衰退，<sup>④</sup>但是在一九九一到一九九四年之間，拉脫維亞的平均通貨膨脹率是三二〇·四%，是所有前蘇聯共和國當中最底的 ( 參見表五 )。由於拉脫維亞的中央銀行能堅持穩定的貨幣政策，所以拉特 ( lat ) 的匯率能夠保持平穩。因此在經濟改革的穩定化 ( stabilization ) 方面，拉脫維亞是相當成功的。

拉脫維亞境內的俄裔不論就絕對數目或是就相對比例而言都是波海三國當中最多的。由於在蘇聯時期俄羅斯人的大量移入，加上拉脫維亞人的出生率又較低，所以在一九八九年人口普查的時候，拉脫維亞人僅占總人口的五二%，這是除了哈薩克以外，所有蘇聯的加盟共和國當中本族人口所占比例最低的。拉脫維亞人認為自己的國家生存受到嚴重的侵害，於是獨立後對境內俄裔的政治權利大加限制，拒絕承認在一九四〇年六月蘇聯占領拉脫維亞後移入的人口為公民，從而迫使許多俄人出走，以致於到一九九六年拉脫維亞人占總人口的比例上升到五五·一%。除了俄裔少數民族的問題之外，位於拉脫維亞境內史克隆達 ( Skruna ) 的早期雷達預警系統與雅伯蘭地區 ( Abrene district ) 的領土爭議也是莫斯科和里加之間爭執的焦點。<sup>⑤</sup>在一九九六年八月，拉脫維亞國會 ( Saeima ) 譴責蘇聯從一九四〇年到一九九一年對拉脫維亞的占領，而俄羅斯的杜馬國會則要求對里加採取經濟制裁。像愛沙尼亞的情形一樣，拉脫維亞的總統烏馬尼斯 ( Guntis Ulmanis ) 常在里加和莫斯科的衝突當中扮演緩和緊張關係的角色，但是烏馬尼斯也是主張儘快加入北約與歐盟來牽制俄羅斯的。從這些發展當中可以看出，拉脫維亞對俄羅斯一貫是採取抗衡的策略，而俄拉兩國的關係自從蘇

註<sup>②</sup> Saulius Girnius, "Restraint and Resentment from the Baltic States," *Transition*, Vol. 2, No. 23 ( November 15, 1996 ), p. 17.

註<sup>③</sup> Saulius Girnius, "Relations Between Estonia and Russia Heat Up," *OMRI Analytical Brief* ( on Internet ), Vol. 1, No. 106 ( May 13, 1996 ).

註<sup>④</sup> 在一九九一到一九九四年之間，拉脫維亞的經濟平均每年衰退了一〇·九% ( 愛沙尼亞是七·九% )。

註<sup>⑤</sup> 經過美國的居間調處，俄拉兩國終於在一九九四年達成協議，允許俄國繼續使用史克隆達基地，直到一九九八年八月三十一日，然後俄方就必須在十八個月內拆除所有的設施。

聯解體以來一直相當惡劣。<sup>③</sup>

### （三）立陶宛

立陶宛在波海三國當中經濟狀況最差，而它對俄羅斯的態度也較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緩和。在一九九一到一九九四年之間，立陶宛的經濟平均每年衰退一六%，通貨膨脹則達到四九一·六%。立陶宛的新貨幣立特（lit）在一九九三年夏天開始發行後尚能維持相當程度的穩定，並且從一九九四年四月開始在四立特比一美元的價位釘住美元。雖然匯率的穩定有利於國際貿易，但是由於立特被高估，所以立陶宛的出口受到不利的影響。在貿易和投資方面，立陶宛自由化的程度不及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這個狀況正反映出立陶宛的經濟基礎不夠堅實，所以不能放手推行經濟改革。

立陶宛的獨立是在「薩尤迪斯」（Sajudis）運動主導之下達成的。「薩尤迪斯」的領袖是堅決反俄的藍斯柏吉斯（Vytautas Landsbergis），他在一九九〇到一九九二年之間以最高委員會主席的身分掌握立陶宛的最高權力。<sup>④</sup>在他主政的這一段時間，由於激烈地要求俄軍迅速撤離立陶宛，使維爾紐斯和莫斯科的關係降到最低點。但是由於經濟狀況的持續敗壞，在一九九二年十月的國會（Seimas）大選當中，薩尤迪斯被繼承共黨的立陶宛民主自由黨（Lithuanian Democratic Liberal Party, LDLP）所擊敗，而在一九九三年三月藍斯柏吉斯也被民自黨的柏拉索斯卡斯（Algirdas Brazauskas）取代，成為在中東歐國家當中共黨透過選舉取回政權的第一個例子。<sup>⑤</sup>

在一九九三到一九九六年，由於是前共黨掌政，立陶宛和俄羅斯的關係逐漸改善。在一九九三年初立陶宛境內的俄軍全部撤出。至於俄裔少數民族的問題，由於俄羅斯人僅占立陶宛總人口的九%，因此維爾紐斯並沒有刻意壓抑俄裔，而莫斯科也沒有反彈，雙方為此並沒有嚴重的衝突。<sup>⑥</sup>維爾紐斯和莫斯科之間剩餘的爭議集中於加里寧格勒——一塊和俄羅斯本土分離，而被立陶宛和波蘭所包夾的俄國領土。雙方爭議

註<sup>③</sup> 烏馬尼斯在一九九三年六月和一九九六年六月兩次被國會選舉為總統，代表拉脫維亞主張抗衡俄羅斯的力量當中較為溫和的一派。在一九九六年總統選舉當中，社會黨（即前共黨）的候選人魯比克斯（Alfreds Rubiks）反對拉脫維亞參加歐盟和北約，並且主張對所有拉脫維亞的永久居民給予公民權。這是扈從的例子。但是魯比克斯在選舉當中只獲得五票，而烏馬尼斯則獲得五十三票，顯見抗衡仍然是拉脫維亞對俄政策的主流。參見 Saulius Girmius, “Guntis Ulmanis Re-Elected Latvia’s President,” *OMRI Analytical Brief* (on Internet), Vol. 1, No. 186 (June 20, 1996).

註<sup>④</sup> 當時依據蘇聯的法律，立陶宛在一九九〇年二月選出了本國的最高蘇維埃（Supreme Soviet），然後再產生最高理事會（Supreme Council），並推選出藍斯柏吉斯為主席。到了一九九二年十月新國會選舉產生之後，最高理事會就被取消，而由國會選出總統。關於「薩尤迪斯」的成立和藍斯柏吉斯在當時所扮演的角色，參見 Richard Krickus, “Lithuania: Nationalism in the Modern Era,” in Ian Bremmer and Ray Taras, eds., *Nations and Politics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註<sup>⑤</sup> 柏拉索斯卡斯在一九八八年十月的時候被選為立陶宛共黨的第一書記，他在一九九三年三月就擊敗藍斯柏吉斯，成為立陶宛的總統。而在拉脫維亞，前共黨的第一書記魯比克斯在總統選舉當中卻完全不能對現任總統烏馬尼斯構成威脅。由此一例子可以看出兩國共黨勢力的差距。

註<sup>⑥</sup> 立陶宛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就通過了一個相當寬容的公民法，對於所有的永久居民不論族裔都給予公民權。參見 Saulius Girmius, “Restraint and Resentment from the Baltic States,” p. 18.

的焦點是莫斯科主張俄羅斯和加里寧格勒之間的軍事交通運輸可以使用公路，而維爾紐斯主張只能使用密封的火車箱。為此俄羅斯拒絕給予立陶宛貿易最惠國待遇，更對立陶宛的進口課徵五〇%的進口稅。由此可見立陶宛相對溫和的對俄政策並沒有真正改善兩國的關係。因為俄羅斯一再施加經濟壓力，立陶宛也和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一樣努力將其對外的經濟活動轉向西方，從而減少了對莫斯科的經濟依賴。在一九九六年十至十一月國會大選過後，保守黨（Conservatives of Lithuania）大獲全勝，黨魁藍斯柏吉斯出任國會議長，在民自黨掌政前擔任總理的瓦格諾瑞耶斯（Gediminas Vagnorius）重新出任總理，大批舊政府的官員重新入閣。<sup>④</sup>在這種態勢之下，立陶宛對俄羅斯的抗衡政策將會更為明顯。

雖然波海三國在經濟上較為發達，不必處處仰賴莫斯科，但是對於俄羅斯的領土野心 and 軍事威脅卻不能不加以提防。首先，三國都拒絕加入由莫斯科所主導的獨立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而所有其他的前蘇聯共和國都先後加入了。<sup>⑤</sup>由於三國都是小國寡民，在軍事力量上不可能靠本身的力量和俄國相抗，所以只有訴諸外援。三國都積極尋求加入歐盟（EU）和北約（NATO），同時努力改進和華盛頓之間的關係，希望美國能夠提供一定形式的安全保障。<sup>⑥</sup>因此立陶宛成爲第一個申請加入由華盛頓所主導的「和平夥伴」計畫（Partnership for Peace Program）的國家，而波海三國在一九九四年都已經加入此一計畫，並且參與在克羅埃西亞（Croatia）和波士尼亞（Bosnia）的維持和平任務。<sup>⑦</sup>在一九九四年三月，立陶宛和它的歷史宿仇波蘭簽訂友好條約，表示相互支持，來對抗從俄羅斯傳來的壓力。在一九九四年六月，愛沙尼亞和中國大陸簽訂了一個具有爭議性的協定，保證不會承認臺灣，冀以爭取中共的支持。<sup>⑧</sup>波海三國並且透過各種外交活動以使西方國家相信，如果莫斯科侵略他們，就是重建蘇聯的前奏，而這是西方所不可能容忍的。

美國和西方國家對於波海三國的態度基本上是支持的。雖然由於俄羅斯的強力反對，美國在一九九六年九月表示北約的第一波擴張行動不會包括愛、拉、立三國，但是美國也重申目前只是時機未到。而三國則一致表示要繼續申請加入北約，並且將增強本國的軍事力量。從這些動作當中可以看出，西方對於波海三國有相當大的關切，而三國也繼續努力爭取西方的支持，以抗衡來自莫斯科的壓力。

註④ 除了藍斯柏吉斯和瓦格諾瑞耶斯之外，例如立陶宛基督教民主黨的主席邵達格斯（Algirdas Saudargas）曾經在一九九〇到一九九二年間擔任外長，在新內閣中他仍然擔任此一職務。參見 Saulius Girnius, "New Lithuanian Government Sworn In," *OMRI Analytical Brief* (on Internet), Vol. 1, No. 507 (December 11, 1996)。

註⑤ 納扎巴耶夫在一九九五年解散了國會，並且透過公民投票將其總統任期延長到西元二千年（原本應在一九九六年舉行）。參見吳玉山，「獨立國協政經概況－以俄羅斯爲主」，歐洲聯盟最新發展暨俄羅斯獨立國協政經情勢研討會，中歐貿易促進會，臺北，民國八十五年六月六日。

註⑥ 三國目前都是歐盟和西歐聯盟的準會員。

註⑦ Saulius Girnius, "Restraint and Resentment from the Baltic States," p. 19.

註⑧ Wolfgang Drechsler, "Estonia in Transition," p. 113.



在前蘇聯的十四個少數民族共和國當中，波海三國是非常獨特的。它們以最小的面積和人口卻對莫斯科採取了最對抗性的政策。從以上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出，成熟的經濟，和與西方的密切聯繫是三國選擇抗衡政策最重要的原因。在三國當中經濟較為堅實的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自獨立以來就沒有改變抗衡莫斯科的基調，而經濟情況最差的立陶宛則在抗衡的大戰略之下，曾經在前共黨掌政期間（一九九二～一九九六）試圖緩和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不過雙方的關係仍然未見根本的改善。總而言之，波海三國可以說是小國對大國採取抗衡策略的典範。

## 二、中亞五國

相對於波海三國的抗衡政策，中亞五國對俄羅斯所採取的是典型的扈從政策。這個政策不因爲各國在領土、人口和國力上的巨大差距而有所不同，不因爲各國境內俄裔人口的多寡而表現出顯著的差異，也不因爲各國在政治上開放的程度而受到影響。決定扈從政策的基本因素是中亞五國在經濟上依賴俄羅斯，在外交上又不能獲得西方的奧援。在這個基本架構之下，抗衡的代價太大，扈從因此成爲自然的選擇。

### （一）哈薩克

在中亞五國當中和俄羅斯關係最密切的是哈薩克。蘇聯時代哈薩克曾經受到莫斯科的殘酷對待，包括在史達林集體化的時期消滅了哈薩克四分之一的人口，又在以後的急速工業化時期湧入了大量的俄羅斯人（一次在一九二〇到一九三〇年代，主要是被史達林所驅趕的俄羅斯「富農」；一次是在一九五〇年代，主要是受到赫魯雪夫「處女地」經濟改革鼓舞的俄羅斯人），使得哈薩克成爲所有蘇聯的加盟共和國當中唯一一個本族人口不超過半數的國家。<sup>④</sup>然而這些創傷抵不過莫斯科提供的經濟吸引力。在一九九〇年的時候，蘇聯對哈薩克的財政補助相當於哈薩克當年 GDP 的一三·六%，<sup>⑤</sup>結果哈薩克成爲所有十五個加盟共和國當中最後一個脫離蘇聯的國家。

從獨立前到獨立後，哈薩克一直是在納扎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ev）的領導之下。納扎巴耶夫是蘇聯時期哈薩克共黨的第一書記，他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被選舉爲哈薩克的總統。像大部分的中亞國家一樣，哈薩克的政治改革進行有限，所以納扎巴耶夫所推行的事實上是威權專制。<sup>⑥</sup>他深切了解到哈薩克對俄羅斯的依賴，所以一貫採取扈從的態度，在內政上則很技巧地調和於兩大族裔之間。然而扈從於莫斯科的目的並不是想要重新成爲俄羅斯的一部分，而是利用和莫斯科的親密關係來減低被俄

註④ 參見 Martha Brill Olcott, "Kazakhstan: A Republic of Minorities," in Ian Bremmer and Ray Taras, eds., *Nations and Politics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313.

註⑤ 參見 EIU Country Profile: *Kazakhstan, Kyrgyzstan, Tajikistan, Turkmenistan, Uzbekistan*, 1995~1996, p. 12.

註⑥ 納扎巴耶夫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一日總統選舉時沒有競選對手，並且獲得了九八%的選票支持。這是蘇聯時期共黨選舉的模式。

國侵害的可能，以維持國家獨立。<sup>④</sup>這正是一般哈薩克人所贊成的對俄政策。<sup>⑤</sup>

納扎巴耶夫的對俄政策是有其深刻的經濟根源的。從一九九〇到一九九四年，哈薩克的人均GDP下跌了四五%，GDP每年平均下跌一二·九%。經濟危機加深了哈薩克對於俄羅斯的依賴。在剛從蘇聯獨立出去的時候，哈薩克由於緊緊地依附蘇聯，盡力維持各種優惠關係，又暫時不推行劇烈的經濟改革措施，所以在經濟上並沒有產生巨大的波動。然而在一九九三年俄羅斯強迫中亞國家退出盧布區，發行自己的貨幣，結果對哈薩克的經濟造成巨大的衝擊。<sup>⑥</sup>在一九九四年一月到三月之間，哈薩克的坦格（tenge）對盧布劇跌了六〇〇%。<sup>⑦</sup>在外部傳來經濟震動和本身缺乏財政紀律的情形之下，哈薩克的年通貨膨脹率在一九九四年躍升到一九〇%。為了壓抑通膨，中央銀行從一九九四年九月間開始抽緊銀根，結果又導致嚴重的經濟萎縮，使得當年的GDP跌落了二五%，而人均GDP也跌落了二四%（參見表二）。在總體經濟失衡的情況之下，哈薩克被迫展開大幅度的經濟改革，在一九九四年四月提出快速私有化的方案，但是成果有限。<sup>⑧</sup>

在一九九四年的經濟危機當中，哈薩克舉行了新國會（Supreme Kenges）的選舉。納扎巴耶夫本來以為新國會會比較支持他的經濟改革方案，但是結果在新選出的國會議員當中，行政首長、企業經理和農產主任等官僚體制內的人員就占了九〇%，最後還導致長期擔任總理的捷列申科（Sergei Tereshchenko）下台。新總理卡任格爾津（Akezhan Kazhegeldin）固然也支持經濟改革，但是他的計畫在國會中受到很大的阻力。<sup>⑨</sup>哈薩克的經濟狀況仍然未能顯著改善，<sup>⑩</sup>並且波及到內部的族群和諧。<sup>⑪</sup>面對國會中反對勢力的挑戰，納扎巴耶夫的做法是仿效俄羅斯的葉爾欽（一九九三年十

註④ 這一點可以從納扎巴耶夫反對俄羅斯所要求的允許境內俄裔享有雙重國籍一事當中看出來。參見 *RFE/RL Daily Report*, No. 28 (February 10, 1994)。

註⑤ 根據一九九五年在哈薩克所做的一項民意調查，八七%的受訪者認為和俄羅斯聯盟是保障哈薩克獨立最好的方式。參見 Bruce Pannier and Peter Rutland, "Central Asia's Uneasy Partnership with Russia," *Transition*, Vol. 2, No. 23 (November 15, 1996), p. 27.

註⑥ *EIU Country Profile: Kazakhstan, Kyrgyzstan, Tajikistan, Turkmenistan, Uzbekistan*, 1995-1996, p. 16.

註⑦ Kirill Nourzhanov and Amin Saikal, "The New Kazakhstan: Has Something Gone Wrong?" p. 227.

註⑧ 至今（一九九六年）哈薩克私有部門的比重僅占總產值的三〇%。

註⑨ 參見 Bess A. Brown, "Overriding Economics," *Transition: 1994 in Review*, Part II (February 1995), pp. 53-56.

註⑩ 經過了多年的連續下跌之後，哈薩克的經濟在一九九六年有可能會有〇·五%的成長，而通貨膨脹率則被壓抑到二七%。參見 *OMRI Economic Digest* (on Internet), Vol. 2, No. 45 (November 7, 1996)。

註⑪ 惡化的經濟自然不利於哈薩克裔和俄羅斯裔之間的種族和諧。同時在一九九四年三月七日的新國會選舉當中，哈薩克三八%的俄裔人口只選出全部一七六席國會議員當中的四九席，占總數的二八%。而占總人口比重四二%的哈薩克裔則選出了一〇五席國會議員，占總數的六〇%。這個選舉結果導致哈薩克兩大族裔之間的衝突增加，俄裔政治領袖蘇普魯紐克（Boris Suprunyuk）隨之被捕。在年底的時候，哈薩克北部的哥薩克人更要求哈薩克取消獨立，結果引來政府的壓制。參見 *RFE/RL Daily Report*, No. 54 (March 18, 1994); No. 72 (April 15, 1994); No. 221 (November 22, 1994); No. 225 (November 30, 1994)。

月）與吉爾吉斯的阿卡耶夫（一九九四年九月），而在一九九五年的三月解散了國會，並且在四月的公民投票當中將自己的任期延長到二〇〇〇年。<sup>⑤</sup>

在經濟危機的壓力之下，納扎巴耶夫更加緊了和俄羅斯的聯繫。他的選擇空間其實很有限。在一九九五年，哈薩克有五〇%的對外貿易是和俄羅斯進行的。<sup>⑥</sup>由於要從俄羅斯進口大量能源，哈薩克更積欠了俄國四億五千萬美金的債務。阿馬達（Almaty）實在沒有抗衡莫斯科的本錢。結果納扎巴耶夫除了不斷主張加強獨立國協國家之間的聯繫之外，他更在一九九四年三月提出了要和俄羅斯建立歐亞聯盟（Eurasian Union）。<sup>⑦</sup>在一九九五年一月，他又倡議和俄羅斯與白俄羅斯成立三國關稅同盟。到了一九九六年三月，哈薩克、俄羅斯、白俄羅斯與吉爾吉斯更簽訂條約，決定更進一步地整合四國的經濟。在國防安全方面，哈薩克現有的國防武力是以前蘇聯派駐在當地的部隊為主，納扎巴耶夫並寄望由俄羅斯來訓練哈薩克的國防軍。<sup>⑧</sup>在外交事務上，納扎巴耶夫處處以俄羅斯馬首是瞻。雖然他也和美國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例如同意華盛頓的要求將境內的核武讓出交由俄羅斯管理，並且成爲在中亞國家當中接受美國援助最多的國家。<sup>⑨</sup>但是他清楚地了解到，對哈薩克而言，莫斯科比華盛頓重要得多。在卡拉察干納克（Karachaganak）和坦吉斯（Tengiz）的石油與天然氣的開採案上，阿馬達就不惜得罪英國和美國的石油公司，而讓俄國人獲得利益。<sup>⑩</sup>所以在經濟、國防和外交等各方面，阿馬達毫無疑問地是採取扈從莫斯科的路線。

## （二）吉爾吉斯

吉爾吉斯和哈薩克比較起來有相當大的不同。吉爾吉斯小國寡民，人口僅及哈薩克的四分之一。在中亞五國當中，吉爾吉斯被認爲是唯一堪稱實行民主改革的國家。總統阿卡耶夫（Askar Akaev）也是五位中亞國家總統當中唯一的非共人士（其他四位都是前共黨的統治者）。<sup>⑪</sup>然而這些自然、人文和政治背景上的不同並沒有帶來兩國在對俄政策上的差異。哈薩克和吉爾吉斯都是俄羅斯的忠實扈從者。

阿卡耶夫在一九九一年十月透過直接民選成爲吉爾吉斯的總統。像納扎巴耶夫一

註⑤ *The Economist*, March 18, 1995, p. 40.

註⑥ *EIU Country Profile: Kazakhstan, Kyrgyzstan, Tajikistan, Turkmenistan, Uzbekistan*, 1995~1996, p. 26.

註⑦ 參見 *RFE/RL Daily Report*, No. 62 (March 30, 1994).

註⑧ 在一九九四年五月四日哈薩克的國防部長努曼岡別托夫（Sagadat Nurmagambetov）宣稱和俄羅斯的國防合作是哈薩克國防政策的基石。參見 *RFE/RL Daily Report*, No. 86 (May 4, 1994)。

註⑨ 在一九九四年二月納扎巴耶夫於訪美時向美國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表明，哈薩克已同意加入防止核子武器擴散條約，並且因此獲得了美金三億一千一百萬的經濟援助，加上八千五百萬拆除蘇聯核武的補助。參見 *RFE/RL Daily Report*, No. 31 (February 15, 1994)。

註⑩ 參見 *RFE/RL Daily Report*, No. 166 (September 1, 1994)。

註⑪ 阿卡耶夫在蘇聯時期不是共黨的第一書記，但也並非和政治絕緣。在一九八七到一九九〇年，阿卡耶夫是吉爾吉斯科學院的院長。他在一九九〇年由國會選舉爲總統。

樣，他很有技巧地調和於本族裔和俄裔之間，獲得了雙方的支持。<sup>⑤</sup>阿卡耶夫在就任之初便以推動經濟改革當做最重要的施政目標。由於他不是出身於共黨官僚，並沒有承續既有的專政統治模式，所以吉爾吉斯的媒體得以時常批評政府的施政，共黨的前任第一書記烏蘇巴里耶夫（Turdakan Usulbaliev）和馬薩李耶夫（Absamat Masaliev）也可以獲選為國會議員，在議會中領導反對力量來制衡阿卡耶夫。<sup>⑥</sup>這個較為民主的政治環境，慢慢地卻逐漸成為阿卡耶夫推動經濟改革的阻力，最後演變成俄羅斯式的劇烈府會之爭。<sup>⑦</sup>

在吉爾吉斯的經濟改革起步之時，正面臨蘇聯瓦解，各加盟共和國的市場喪失，從俄羅斯和土庫曼輸入的能源價格大幅攀升，因此經濟局面非常惡劣。在一九九二年八月吉爾吉斯又發生了一次大地震，對農牧業造成很大的損害。天災人禍的結果，當年的GDP下跌了二五%。由於一方面物資匱乏，一方面吉爾吉斯又和俄羅斯同步推行激進的價格改革，因此物價騰漲，通貨膨脹率高達八五五%。雖然經濟受到巨大的創傷，但是阿卡耶夫仍堅持震盪改革，指示政府在七月推出了大規模的私有化計畫，要在十八個月內徹底改變吉爾吉斯的產權結構。然而經濟改革進行不順利，而外來的衝擊又不斷發生。在一九九三年俄羅斯決定發行新盧布，吉爾吉斯雖然比哈薩克早一步在五月就先行退出盧布區，發行了自己的通貨宋姆（som），減低了貨幣改制和交易條件變動的衝擊，但是和俄羅斯金融分離的結果，仍然造成一、二〇九%的通貨膨脹，和一六%的經濟萎縮。

和哈薩克一樣，吉爾吉斯嚴重的經濟危機對政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由於吉爾吉斯的政治較為民主，因此在一九九三年底出現了倒閣的危機，阿卡耶夫本人的政治生命也危在旦夕。受到俄羅斯十月事件的影響，阿卡耶夫決定和國會（Zhogorku Kenesh）攤牌。他先在一九九四年一月訴諸公民投票，探測選民對他的支持。然後藉著九六·二%的高支持率支使議員杯葛國會，使得它不能開議，也不能決定本身改選的時間，從而自行瓦解。<sup>⑧</sup>在九月時朱馬古洛夫（Apas Dzhumagulov）政府因為國會不存在而宣布總辭，阿卡耶夫立刻直接以總統的地位統治全國。在十月阿卡耶夫又發動

註⑤ Gene Huskey, "Kyrgyzstan: the Politics of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Frustration," in Ian Bremmer and Ray Taras, eds., *Nations and Politics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409.

註⑥ 參見 EIU *Country Profile: Kazakhstan, Kyrgyzstan, Tajikistan, Turkmenistan, Uzbekistan*, 1995~1996, p. 34.

註⑦ 關於民主政體和經濟改革之間的關係，參見 Juliet Ellen Johnson, "Should Russia Adopt the Chinese Model of Economic Reform,"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27, No. 1 (March 1994), pp. 59~75; Włodzimierz Brus, "Market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the Sino-Soviet Divergence,"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7, No. 4 (1993), pp. 423~440; 與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台北：正中，民國八十五年），第六章。

註⑧ Bess A. Brown, "Overriding Economics," *Transition: 1994 in Review*, Part II (February 1995), p. 55.



一次公民投票，確定了新的憲政架構，設置了一個僅有三十五人的下院（Legislative Assembly），並在一九九五年二月舉行選舉，創造了一個聽命的國會。到了十二月總統大選，阿卡耶夫獲得七一·六%選民的支持，繼續掌握政權。

在一九九四年政爭的時候，阿卡耶夫仍然推動經濟改革，並且採用劇烈的穩定化措施來控制通貨膨脹，以滿足IMF的要求。結果當年的通脹率下降到八七·二%，穩定化的成績斐然，然而GDP卻下跌了二六%。不過由於吉爾吉斯和國際金融組織的配合，所以獲得了大量的貸款，對於持續穩定吉爾吉斯的經濟局面有若干幫助。<sup>⑤</sup>

總體說來，吉爾吉斯雖然由於在一九九四年之前推行民主，獲得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支持，<sup>⑥</sup>又因為盡力滿足了國際金融組織緊縮的要求，推動在中亞最徹底的經濟改革，所以獲得了中亞各國當中最高的人均貸款，但是它的總體經濟發展程度仍然非常低（在所有前蘇聯共和國當中排名倒數第三），對於俄羅斯的經濟依賴也非常大。由於在經濟改革的過程當中生產不斷萎縮，阿卡耶夫更需要仰仗莫斯科的支援，尤其是能源的供應。此外在吉爾吉斯四億七千萬美金的外債當中，俄羅斯占了一億三千三百萬。<sup>⑦</sup>因此吉爾吉斯一貫保持對俄親善扈從的態度，不但積極參與由莫斯科所主導的各項獨立國協的合作計畫，更加入了由俄羅斯、哈薩克和白俄羅斯所倡議的關稅同盟條約。在國家安全方面，吉爾吉斯的一萬二千名國防軍其實是俄羅斯軍隊。<sup>⑧</sup>當南方的塔吉克戰事轉趨劇烈，回教基本教義派不斷攻城掠地之際，吉爾吉斯更只有仰賴莫斯科的防護。和哈薩克一樣，吉爾吉斯是俄羅斯在中亞最忠實的扈從者。

### （三）塔吉克

在所有前蘇聯的共和國當中，塔吉克受內戰的影響最為嚴重。這個國家的人口構成相當複雜，除了有二四%的烏孜別克人和八%的俄裔之外，在塔吉克人當中也區分為北方的霍揚得人（Khojandis）和南方的庫列伯人（Kulyabis）、噶姆人（Garmis）與帕米爾人（Pamiris）等。由於塔吉克北方的工業化程度較深，俄羅斯的影響力較強，所以霍揚得人很自然地成為莫斯科的盟友，在蘇聯時期是統治階級。在南方，庫列伯人是霍揚得人的合作夥伴，<sup>⑨</sup>至於噶姆人和帕米爾人則受到各方面的歧視，是勞

註⑤ Bruce Pannier and Peter Rutland, "Central Asia's Uneasy Partnership with Russia," *Transition*, Vol. 2, No. 23 (November 15, 1996), p. 28.

註⑥ 在一九九四年一月吉爾吉斯舉行對阿卡耶夫的公民信任投票時，美國總統柯林頓派遣副總統高爾到畢什凱克（Bishkek）為阿卡耶夫助勢，充分表現了美國的支持。

註⑦ 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俄羅斯和吉爾吉斯簽訂協議，同意延緩吉爾吉斯償付債務至二千年。為此吉爾吉斯允許俄羅斯國家或私人取得吉爾吉斯產業的多數股份。參見 *OMRI Economic Digest* (on Internet), Vol. 2, No. 50 (December 12, 1996)。

註⑧ 關於兩國的密切軍事合作，參見 *RFE/RL Daily Report* (on Internet), No. 138 (July 22, 1994)。

註⑨ 塔吉克在獨立後的兩位總統——納比耶夫（Rakhmon Nabiev）和拉賀蒙諾夫（Imomali Rakhmonov）分別是霍揚得人和庫列伯人。前者來自北方的列寧納巴德省（Leninabad），後者來自南方的庫列伯省（Kulyab）。



役階級。<sup>②</sup>在一九九一年蘇聯崩解之際，塔吉克宣布獨立，並且舉行了總統選舉。結果原共黨領袖、代表北方的納比耶夫（Rakhmon Nabiev）獲勝，而南方人士、民主派和一些回教領袖認為選舉不公，舉行抗議，政府則強制鎮壓，塔吉克的內戰於焉爆發。<sup>③</sup>

由於南方的塔吉克人獲得他們在阿富汗同族的支持，使得塔吉克的內戰和阿富汗的戰爭連繫在一起，<sup>④</sup>而將回教基本教義派的力量引入，造成莫斯科很大的恐慌。<sup>⑤</sup>在一九九二年秋天，俄羅斯和烏孜別克正式介入塔吉克的內戰，幫助霍揚得人和庫列伯人來鎮壓噶姆人與帕米爾人的反抗。一年之後，以俄羅斯為首的獨立國協和塔吉克簽訂條約，由俄羅斯、哈薩克、烏孜別克和吉爾吉斯四國派軍幫助杜珊別（Dushanbe）防守塔吉克與阿富汗的邊界，並將其視為獨立國協的共同邊界。俄羅斯和塔吉克在一九九三年五月又簽訂了友好互助合作條約與四個軍事協定，以給予俄軍法律地位。<sup>⑥</sup>雖然莫斯科的協助一時穩定了塔吉克的政局，但是叛軍不斷從阿富汗的邊境發動攻勢，攻城掠地，使得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成立的拉賀蒙諾夫（Imomali Rakhmonov）政權經常處於危急存亡之秋。<sup>⑦</sup>

在這種內戰狀態之下，塔吉克的經濟情況不言可喻。由於塔吉克原本就是前蘇聯各國當中生活水平最低的，戰爭和蘇聯國內貿易的崩潰更使它的生產和物價急劇惡化，民生益加困苦。<sup>⑧</sup>在一九九三年塔吉克又有洪水為患，天災人禍紛至沓來。此時只有莫斯科能夠支撐塔吉克的經濟。在各國對杜珊別總共七億三千一百萬美金的貸款當中，俄羅斯提供了四億。俄羅斯同時供應低價燃料，並且容許塔吉克長期留在盧布區內。簡而言之，沒有俄羅斯在軍事和經濟上的支持，塔吉克的拉賀蒙諾夫政權早已不能支持。<sup>⑨</sup>處於此種狀況之下，塔吉克在各種國際場合自然成為莫斯科的扈從，對俄羅斯的政策全力支持。

註<sup>②</sup> Anthony Richter, "Springtime in Tajikistan,"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11, No. 2 (Summer 1994), p. 84.

註<sup>③</sup> 塔吉克的內戰基本上是一個族群問題，而不是共產黨、回教基本教義派和民主主義者之間的對抗。反對納比耶夫和拉賀蒙諾夫政權的噶姆人與帕米爾人並不是激進的什葉派回教徒，也不是虔誠的民主主義者。他們反抗的目的是為南方爭取平等的地位。參見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24, 1994, p. 39.

註<sup>④</sup> 這些阿富汗的勢力就是長期和蘇聯作戰的穆加哈丁（mujahideen）游擊隊。

註<sup>⑤</sup> 俄羅斯將塔吉克南方回教徒對政府的反抗視為回教基本教義派對前蘇聯共和國的攻擊。莫斯科認為如果俄國不能夠幫助杜珊別政府在塔吉克——阿富汗邊境阻擋住基本教義派的侵襲，則中亞可能會成為激進回教勢力的天下，數百萬難民將會蜂湧北上，而俄羅斯就必須在俄國和哈薩克的綿長邊境來防禦回教力量。參見 *World Press Review*, Vol. 42, No. 4 (April 1995), p. 30.

註<sup>⑥</sup> 參見李玉珍，「塔吉克內戰及其發展」，*問題與研究*，第三十四卷第十二期，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頁三五～四四。

註<sup>⑦</sup> 拉賀蒙諾夫最初是以國會（最高蘇維埃）主席的身分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出掌政權。到了一九九四年十一月總統大選之後，拉氏即成為正式的總統。參見 Bruce Pannier and Peter Rutland, "Central Asia's Uneasy Partnership with Russia," p. 28.

註<sup>⑧</sup> 在一九九二年塔吉克的GDP下跌了二九%；一九九三年是一一%；而一九九四年是二一%。

註<sup>⑨</sup> *The Economist*, February 3, 1996, pp. 30~31.

#### 四烏孜別克

烏孜別克是中亞人口最多的國家，在全蘇聯也僅次於俄羅斯和烏克蘭。它境內的俄裔只有八%，而本族人口占了七一%，相對於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甚至土庫曼而言，這都是一個較有利於多數族群統治的人口組成。由於天然資源豐富，各種製造業發達，過去曾是中亞的文明中心，有塔什干（Tashkent）、薩馬爾干（Samarkand）、布哈拉（Bukhara）、基發（Khiva）等名城，又曾是蘇聯在中亞的軍事和行政中心，科學和文化薈萃之所，所以烏孜別克有能力成為中亞的領袖，在歐亞新興國家當中和俄羅斯與烏克蘭鼎足而三，互爭雄長。<sup>④</sup>然而，烏孜別克的對俄政策卻始終沒有超脫扈從的大方向，這還是受到經濟依賴與外交限制的影響。

像哈薩克一樣，烏孜別克現今的領導階層仍然是當年的共黨領袖。總統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是戈巴契夫一手提拔的烏孜別克共黨第一書記。他在蘇聯解體的前後，轉身蛻變為烏孜別克的民族主義者，以此博取人民的支持。<sup>⑤</sup>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的總統選舉當中，卡里莫夫以強力壓制反對黨而獲勝。<sup>⑥</sup>接著卡里莫夫就肆行威權專政，打擊民族主義分子（統一黨 Birlik 和自由黨 Erk）和回教基本教義派（回教復興黨）的政治力量，並且透過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所通過的新憲法大幅擴張總統職權，最後並在一九九五年三月將自身的總統任期延長到二〇〇〇年。<sup>⑦</sup>國會（Olii Majlis）雖然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改選，但是仍然是由共黨改名的人民民主黨掌控，對卡里莫夫唯命是從。

卡里莫夫雖然在內政上保持強勢，但是在對俄關係上卻仍然採取扈從的態度，而這和它的經濟狀況是極其相關的。和吉爾吉斯不同，烏孜別克並沒有在一九九二年與俄羅斯同步採取激進的經濟改革，反而是用盡一切手段來穩定生產，維持就業。<sup>⑧</sup>由於國家仍然用行政手段來控制價格，烏孜別克在一九九二年的通貨膨脹率只有五二八%，僅次於土庫曼的四九三%，在所有前蘇聯共和國當中表現居於第二位（參見表五）。穩定的棉花和黃金生產也為烏孜別克減少了因為蘇聯瓦解所帶來的衝擊。然而烏孜別克保持相對經濟穩定最重要的原因是塔什干（Tashkent）在經濟上緊緊地依附俄羅斯，保留了許多蘇聯時期的經濟管道。不過到了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盧布區宣告

註④ S. Frederick, "Making Eurasia Stable," pp. 80~92.

註⑤ 在卡里莫夫之前的三位烏孜別克第一書記拉西都夫（Sharaf Rashidov）、烏斯馬霍雅耶夫（Inamjon Usmakhojaev）和尼沙諾夫（Rafik Nishanov）都被指控為貪污。等到卡里莫夫掌握大權之後，他利用民族主義的浪潮，將這些前任共黨領袖描述為受俄羅斯人迫害的烏孜別克官員。

註⑥ Roger D. Kangas, "Imposing Order on Uzbekistan," *Transition*, Vol. 2, No. 18 (September 6, 1996), pp. 26~29.

註⑦ 在延長總統任期由一九九七年到二千年的公民投票當中，卡里莫夫獲得九九·六%的支持，投票率則高達九九·三%，完全是遵行蘇聯的模式（投贊成票的不必圈選，只有投反對票的才要進入投票區在選票上作記）。參見 S. Frederick Starr, "Making Eurasia Stable," p. 88;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21, 1996, p. 41.

註⑧ 參見 EIU Country Profile: Kazakhstan, Kyrgyzstan, Tajikistan, Turkmenistan, Uzbekistan, 1995~1996, p. 112.

崩潰，烏孜別克被迫發行自己的貨幣（宋姆代用券，som coupon），它的經濟危機就無可避免了。此時爲了要獲得IMF和世界銀行的貸款，烏孜別克不得已宣布施行經濟改革，包括在一九九四年一月的私有化改革，五月的價格改革和破產法，以及七月的貨幣改革等。然而卡里莫夫的經改哲學是漸進式的。◎在私有化上他只針對小企業和邊際的國有企業推行，而在價格改革的同時他又加發工資和退休金以減低社會衝擊。土地至今不能自由買賣，而全國的灌溉渠道與棉花生產也仍然牢牢地掌握在國家手中。◎由於經改牛步化，烏孜別克和IMF之間的協議比吉爾吉斯晚了一年半，也比哈薩克晚了一年。

卡里莫夫的威權統治和經改的延宕使得他在西方國家當中聲名狼籍，也使得他的外交選擇有限。◎在經濟上，烏孜別克的貿易有三〇%是和俄羅斯進行的。由於烏孜別克是單一出口品國家，◎對於國際貿易依賴很大，卡里莫夫又認爲只有儘量維持舊蘇聯的經濟管道才能保持烏孜別克的經濟穩定，所以他一直不遺餘力地主張經濟整合，也就是主張和莫斯科保持良好的經濟關係。在國防上烏孜別克一直視東方阿富汗和塔吉克的回教基本教義派爲最大的敵人，因此主張強力干預這兩個國家的內戰，以防止回教勢力席捲中亞。而在這一點上，烏孜別克更必須仰賴俄羅斯的支持。◎由於這些原因（外交上的缺乏選擇、經濟上的需求與國防上的共同利益），塔什干從獨立以來一直是莫斯科的扈從者。◎雖然卡里莫夫在對俄態度上比塔吉克的拉賀蒙諾夫、吉爾吉斯的阿卡耶夫和哈薩克的納扎巴耶夫較爲獨立，同時他也試圖減少對莫斯科的依賴，以及發展本國的潛力，◎但是在客觀條件的限制之下，卡里莫夫仍然不可避免地扮演著扈從者的角色。

### (五)土庫曼

土庫曼的總統尼雅佐夫（Sapamurad “Turkmenbashi” Niyazov）在中亞是和卡里莫夫齊名的獨裁者。◎尼雅佐夫也是前蘇聯時代共黨的第一書記，在獨立時被選爲總統。以後他在阿什葛巴德（Ashgabad）肆行威權專制，推動個人崇拜，◎建立了領袖個人和黨國合一的政權，以總統之尊兼任總理與執政黨土庫曼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 of Turkmenistan，即前共黨）的主席。像哈薩克與烏孜別克一樣，土庫曼在一九九四年

註◎ Roger D. Kangas, “Imposing Order on Uzbekistan,” p. 29.

註◎ S. Frederick Starr, “Making Eurasia Stable,” p. 90.

註◎ 參見 *The Economist*, April 8, 1995, p. 37.

註◎ 在一九九五年烏孜別克的出口當中棉花占了七六%。

註◎ Bruce Pannier and Peter Rutland, “Central Asia’s Uneasy Partnership with Russia,” p. 28.

註◎ 塔什干的對俄政策並未影響到烏孜別克國內民族主義的興起，與卡里莫夫操縱本土化情緒的態度。在這種情勢之下，俄羅斯人在烏孜別克的優勢經濟地位也不復存在，並且大量地移出首府塔什干。參見 Craig Smith,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Ethnicity,”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Vol. 37, No. 2 (Summer 1995), pp. 97~110.

註◎ S. Frederick Starr, “Making Eurasia Stable,” p. 87.

註◎ 尼雅佐夫號令全國尊稱其爲「土庫曼巴什」（Turkmenbashi，即土庫曼之領袖），夾在他的名字當中，表示個人與國家合一。

註◎ 參見 *World Press Review*, Vol. 42, No. 10 (October 1995), p. 25.

舉行了國會(Majlis)選舉，結果執政黨大獲全勝；<sup>⑤</sup>而在同年的公民投票當中，尼雅佐夫更將自己的任期延長到二〇〇二年。<sup>⑥</sup>尼雅佐夫對於反對運動的壓制相當成功。<sup>⑦</sup>由於地處僻遠，形勢孤立，民智未開，尼雅佐夫又以土庫曼巨大的天然氣資源為後盾，向人民保證要在十年之內將土庫曼建設成中亞的科威特，所以他的個人獨裁統治相當穩定。<sup>⑧</sup>

土庫曼的主要產品是棉花、石油和天然氣，尤其以後者為最重要。在蘇聯時代，土庫曼以優惠價格對其他的加盟共和國提供油氣，等於是變相補貼。在一九九〇年這種補貼的金額高達八億六千五百萬美金。整個算起來，土庫曼對於蘇聯其他地區的淨移轉支付占了其 GDP 的一〇·八%。在所有其他的蘇聯共和國當中，只有俄羅斯和土庫曼一樣是「淨捐助國」(net donor country)。但是在一九九〇年俄羅斯對各加盟共和國的淨移轉支付只占其 GDP 的三·七%（雖然其金額高達美金一百二十六億四千五百萬美金），而俄羅斯由於經濟上的捐輸在蘇聯實際上居於統治民族的地位，土庫曼卻是在各項指標中殿後的貧弱國家。<sup>⑨</sup>由於了解到這個不公平的現象，所以當尼雅佐夫帶領土庫曼從蘇聯獨立之後，便一心想要藉著調整天然氣出口價格的方式來增加外匯收入，帶動經濟的發展，而延緩痛苦的經濟改革，然而這個策略卻沒有成功。<sup>⑩</sup>

在蘇聯時期，土庫曼的一切交通運輸和油氣管線是朝向蘇聯內地的，並沒有建立和外國之間的交通網路。因此在蘇聯解體之後，土庫曼的油氣產品仍然只能夠賣給原來的顧客，阿什葛巴德就對他們提高了產品的售價。但是這些前蘇聯共和國缺乏外匯，根本無力支付積欠土庫曼的款項。在一九九二年，土庫曼和烏克蘭之間還為這個問題爆發了貿易大戰。<sup>⑪</sup>出口不順導致土庫曼油氣的生產減少了六〇%，進口也跟著萎縮。再加上俄羅斯的國家石油公司不讓土庫曼使用其管線輸出天然氣，更導致經濟上的巨大衝擊。土庫曼的 GDP 在一九九二年下跌了五·三%，到了一九九三年由於盧布區的崩潰，GDP 更萎縮了一〇%。同年和前蘇聯各國的貿易在出口方面減

註<sup>⑤</sup> 土庫曼的新國會只有五十席議員，比其前任的蘇聯式議會少了一二五席，為的是使總統較易掌控。候選人都是同額競選，並且只有當五〇%以上的選民將其名字刪去的時候才會被判定落選。官方公布的投票率是九九·八%。參見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7, 1994, pp. 40~41.

註<sup>⑥</sup> 在一九九四年一月的公民投票當中，贊成尼雅佐夫延長任期的占九九·九%。延長任期的理由是使尼雅佐夫能夠主政十年，以完成他十年富國的宏遠計畫。參見 Bess A. Brown, "Overriding Economics," pp. 53~56.

註<sup>⑦</sup> 唯一的一次反對運動示威發生在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三日，結果當局迅速鎮壓，並且將示威人士稱為吸毒者和醉漢。參見 *The Economist*, July 22, 1995, p. 36.

註<sup>⑧</sup> Lowell Bezanis, "Amnesty International on Turkmenistan: Words for Deaf Ears?," *OMRI Analytical Brief* (on Internet), April 12, 1996.

註<sup>⑨</sup> 關於蘇聯各共和國之間透過優惠貿易所產生的移轉支付，參見 Lucjan T. Orłowski, "Indirect Transfers in Trade Among Former Soviet Union Republics: Sources, Patterns and Policy Responses in the Post-Soviet Period,"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5, No. 6 (1993), pp. 1001~1024.

註<sup>⑩</sup> Andy Kuliev, "There is Only One Way Out—By Getting Rid of This Leader and This Government (an interview)," *Transition*, Vol. 2, No. 10 (May 17, 1996), pp. 34~38.

註<sup>⑪</sup> 參見 *EIU Country Profile: Kazakhstan, Kyrgyzstan, Tajikistan, Turkmenistan, Uzbekistan*, 1995~1996, p. 85.



少了七三·五%，在進口方面也減少了六九·六%，形勢非常嚴峻。在一九九四年土庫曼和大部分前蘇聯國家一樣，經歷了最大規模的生產崩潰，GDP減少了二〇%。

出口不振嚴重打擊了土庫曼的經濟成長，此時尼雅佐夫深恐經濟改革會帶來社會不安，影響政治穩定，所以不願意採取激進的經改措施。除了在一九九三年十一月被迫離開盧布區，發行了自己的通貨馬納（Manat）之外，尼雅佐夫在一九九四年五月展開了小企業的私有化，但是成效有限，私有部門僅占總體經濟活動的一五%。在物價方面，由於土庫曼拒絕了IMF所要求的緊縮政策，又不願意實行破產制度，所以通貨膨脹非常嚴重，在一九九二年是四九三%，一九九三年更高達三、一〇二%，而一九九四年則略微回落到二、四〇〇%。在所有前蘇聯的共和國當中，除了遭受戰火蹂躪的塔吉克與高加索三國之外，就數土庫曼經濟改革幅度最小。

由於土庫曼不願意推行大幅度的經濟改革，只希望在維持原有的經濟結構和貿易形態之下，藉改變交易條件來促進成長，所以它的經濟還是相當仰賴莫斯科的。在土庫曼獨立之初，尼雅佐夫曾經爲了貿易問題和莫斯科產生爭執，結果俄羅斯斷絕了對土庫曼肉類、牛奶和麵粉的供應，迫使尼雅佐夫讓步，從此阿什葛巴德就對莫斯科俯首貼耳。除了和俄羅斯親善之外，土庫曼也積極發展和伊朗的關係。自從獨立以來，土庫曼唯一的重大經濟建設就是和伊朗訂約，修築土伊之間的鐵路和油管，其中鐵路的部分已經在一九九六年五月通車。<sup>註⑩</sup>土伊關係的改善固然增加了阿什葛巴德對莫斯科的籌碼，<sup>註⑪</sup>但也更進一步惡化了土庫曼和美國之間的關係。由於政治專制，又和西方所深痛惡絕的伊朗交往，土庫曼在外交上非常孤立。事實上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土庫曼和其他的中亞國家也相當隔閡，尼雅佐夫和其他四位中亞總統也關係疏遠。<sup>註⑫</sup>這使得阿什葛巴德必須和莫斯科維持良好的關係。在國防政策上，俄土兩國合作相當密切，包括俄軍駐防土庫曼和阿富汗的邊界，以防止阿什葛巴德所畏懼的什葉派回教徒勢力進入土庫曼；<sup>註⑬</sup>俄國軍官訓練土庫曼的國防軍；以及俄軍繼續使用土庫曼境內的空軍基地等。阿什葛巴德對莫斯科的親善更可以從前者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給予俄裔雙重國籍一事當中看出來。莫斯科曾經對中亞各國提出同樣的要求，然而只有阿什葛巴德願意給予境內的俄裔這種特殊的地位。總體說來，土庫曼和中亞的其他前蘇聯共和國一樣是對莫斯科採取扈從的態度。（待續）

註⑩ Bruce Pannier, "Iran-Turkmenistan: The Most Important Transportation Junction on the Planet," *OMRI Analytical Brief* (on Internet), May 13, 1996.

註⑪ 俄羅斯希望土庫曼輸出天然氣的管線經過俄國的領土，而土庫曼則希望能夠經由伊朗向外輸出。土伊之間的協定是阿什葛巴德希望加強自身地位的做法，但是伊朗並非可靠的盟友。參見 Andy Kuliev, "There is Only One Way Out—By Getting Rid of This Leader and This Government (an interview)," p. 38.

註⑫ Bruce Pannier and Peter Rutland, "Central Asia's Uneasy Partnership with Russia," p. 28.

註⑬ 土庫曼和阿富汗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土庫曼人是屬於回教的遜尼派，而伊朗和阿富汗卻是屬於較激進的什葉派。然而在伊朗境內有約五十至一百萬的土庫曼人，而在阿富汗境內則有一百~二百萬土庫曼人。阿什葛巴德一直支持烏孜別克的軍閥陶斯唐（General Rashid Dosta）擴張在阿富汗的勢力，以此抗衡阿富汗的基本教義派。參見 David Nissman, "Turkmenistan: Searching for a National Identity," in Ian Bremmer and Ray Taras, eds., *Nations and Politics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95.